

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研究

林冠群

(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系, 台北市 110)

摘要: 本文属唐代吐蕃人物研究之领域, 研究对象为恩兰达札路恭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恩兰达札路恭为公元8世纪中叶时期, 主导吐蕃政局与唐蕃关系的重要人物。由于其姓名、作为、事迹等, 让笔者怀疑其出身非吐蕃本土氏族, 而且学界对于恩兰达札路恭的研究, 仍有不足、缺陷与扭曲之处, 特别是为何后代藏族史家将恩兰达札路恭型塑成吐蕃反佛阵营中的大将, 反对赞普墀松德赞弘佛政策的大奸巨恶, 而唐代文献中的恩兰达札路恭却是一位效忠赞普, 为蕃廷迭立不世出功劳的重臣, 如此巨大的反差, 涉及了西藏历史编纂的方方面面, 值得探索。本文将依据吐蕃碑铭、敦煌古藏文卷子以及汉史料与西藏教法史料所载, 以藏语文知识及史学方法, 由吐蕃重要人物的研究, 扩展到西藏历史编纂。

关键词: 吐蕃人物研究 吐蕃大论 恩兰达札路恭 马重英 长安陷落 西藏史编纂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19) 04-0007-36

一、前言

人物研究于唐代吐蕃史领域而言, 除少数重要人物, 如历代赞普、禄东赞 (mGarston rtsan yul zung? -667)^①之外, 其余由于直接史料传世太少, 在研究上, 常遭到史料不足、文献难征的困扰。^②然而, 唐代吐蕃关系着中国中古时期历史的发展至巨, 某些关

收稿日期: 2018-12-02

作者简介: 林冠群 (1954-), 男, 福建林森人。教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唐代吐蕃史、藏族史、中国民族史、隋唐史研究。

① 新旧《唐书·吐蕃传》对禄东赞有所简要的叙述与评论, 而其他吐蕃大臣, 则未曾受到必要的重视。另于敦煌古藏文卷子之中, 亦载及禄东赞之事迹。请参见李方桂《吐蕃大相禄东赞考》, 《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台北: “中央研究院”, 1981年, 第369页。

② 李方桂氏著有多篇唐代吐蕃人物研究的大作, 文中也多认为唐代史籍中, 关于吐蕃重要人物记载很少, 就是藏文的记载也很简略。见李方桂《钵掣通考》, 文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 台北, 1951, 第443页。另请参见李方桂《马重英考》, 文刊《文史哲学报》第7期, 台北, 1956年, 第1-8页。Fang Kuei Li, “Notes on Stag Sgra Klu Khong”, in Steinkellner, Ernst. eds.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1983. pp. 175-177.

键的吐蕃人物于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为唐代吐蕃历史的发展与唐蕃关系史演进的重要推手，此乃治中国中古史者所必须加以重视，且需着手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者，其中以本文研究的对象——恩兰达札路恭（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是为典型例子之一。

按恩兰达札路恭生卒年不详。于吐蕃赞普墀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 755-796在位）时期，活跃于吐蕃政教，叱咤于唐蕃战场。其曾亲身经历吐蕃多件影响重大的事件，为蕃廷立下不世出的功劳，包括：第一，揭发首席宰相（大论）末东查（vBal ldong tsab）与宰相同平章事朗聂息（Lang myes zigs）弑杀赞普墀德祖赞（Khri lde gtsug btsan 704-754），此事涉蕃廷内部的政教倾轧；第二，乘李唐安史乱兴，曾与其他吐蕃将领带兵鲸吞蚕食李唐河西陇右之地；第三，建议兴兵直取李唐京师，并与其他三位将领攻占长安13天；第四，于长安期间，主导了立新君、改元、署置百官等，成立“傀儡唐廷”；第五，呼应李唐叛臣仆固怀恩，二度领兵入唐参与仆固怀恩之叛乱；第六，其于公元781-782年间出任吐蕃大论（即首席宰相），位极人臣；第七，于公元782年，因反对与唐媾和，遭到撤换，大论位置不保等等。依上述所言，恩兰达札路恭可谓自公元755年至782年之间，长达28年，不但位居要津，而且关系着吐蕃内外所有重大事件。

更令人诧异的是，唐代以后问世的西藏史籍，将其载为一笃信吐蕃旧有宗教本教（Bon po）的大臣，并塑造成为一位带头反对并抵制赞普墀松德赞弘佛政策的“巨奸大恶”型人物，而遭到放逐等。^①唐代文献与唐以后史籍载记如是巨大的反差，正反映了恩兰达札路恭此重要的人物，在古代历史意义上，与今天的史学研究上，均有其重要性并具有重大意义。

有关恩兰达札路恭研究，具体涉及的问题仍待解决者包括：

第一，恩兰达札路恭揭发前任赞普遭弑，因而受到重用，此事涉及蕃廷内部的斗争及政教冲突，特别是牵涉到本教与佛教之间的竞争、王室与大臣之间的倾轧等，有关于此，学界似乎着墨不多，究竟恩兰达札路恭于其中扮演何种角色？第二，据《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所载，为惩罚李唐悔约背盟，恩兰达札路恭向赞普提议攻取长安一事，为何是由恩兰达札路恭倡议？而非其他大臣？此事涉及其出身究为何族有关，学界从未触及此问题，笔者怀疑恩兰（Ngan lam）氏族并非吐蕃本土氏族，疑其可能是外族归化于吐蕃者，本文将查阅藏文史籍，重译敦煌古藏文卷子及吐蕃碑铭，从蛛丝马迹中找出多条线索，一一考实。第三，有关吐蕃攻占长安事件，大陆学者王忠认为：“吐蕃得入长安，纯系偶然机会”^②，笔者曾撰文质疑。^③现大陆学者任小波以为王忠的意见

① 详见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贤者喜宴》）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62., 叶91上，第1-3行。

②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89页。

③ 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6年，第397页。

“似亦有其考量”,^① 笔者以为吐蕃攻占长安事件, 究竟是“偶然”抑或是“必然”? 实有再讨论的必要。第四, 汉史籍所载之“马重英”, 究竟是恩兰达札路恭的汉式名字? 抑或是大陆学界所指称为吐蕃位于青海缘唐边防机构名称? 抑或是因恩兰达札路恭受封采邑的名称而得名? 所谓众说纷纭, 亟待由多方面包括从唐代汉蕃对音的角度等, 对上述诸说提出商榷并重新论证。第五, 恩兰达札路恭可能于公元 781-782 年之间受命为吐蕃大论 (首席宰相), 旋即于 782 年遭撤换, 从此于唐蕃双方的载记上销声匿迹。恩兰达札路恭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失去官位? 第六, 恩兰达札路恭如此重要人物, 曾为吐蕃立下彪炳功绩, 理应名垂青史, 但为何唐代以后的西藏史籍, 将其载成吐蕃反佛阵营的大将, 反对赞普弘佛而遭到放逐? 此涉及恩兰达札路恭的姓氏及其出身的问题, 亦即是否因恩兰 (Ngan lam) 此姓在藏文的意义, 让后代藏族史家有大作文章的依据? 由此角度似可导出吐蕃王朝以后的西藏历史编纂之方方面面。亦即由吐蕃人物的研究, 导向传统西藏僧侣史家的著史动机、著史的价值观念、编纂历史的方法等面向, 饶具史学兴味与历史意义。笔者才疏学浅, 所言者可能有所误失, 期盼论者多予赐教指正。

二、恩兰达札路恭的族属

英国理查逊氏 (H. E. Richardson) 曾撰文怀疑恩兰氏 (Ngan lam) 可能出自中亚地区的氏族, 然而却未述明任何理由予以说明。^② 笔者虽然认同理查逊氏之怀疑, 但是若仅仅怀疑而无进一步论证, 则无法落实恩兰氏族乃非吐蕃本土氏族之主张, 并得以进一步认识吐蕃王朝的多元性。本文基于以上认知, 于相关史籍的载记中, 对于恩兰达札路恭至少发现有五处疑点, 疑其非出自于吐蕃本土的氏族。

(一) 恩兰 (Ngan lam) 姓氏文义不雅驯

就其姓氏恩兰 (Ngan lam) 而言: 按 ngan 字为名词, 意为恶、不幸、污辱,^③ 是为具负面意义的单字, 由 ngan 字所衍生的词汇亦全属负面意义的语词, 诸如 ngan vgro (恶道)、ngan ngon (恶、卑鄙)、ngan pa (恶、劣、丑、谤人者、卑鄙粗下者) 等。^④ lam 字则为道路、行程。^⑤ ngan lam 二字合观则其本义为: “恶习、放纵、行为卑鄙”,^⑥ 于张怡荪所编之《藏汉大辞典》上则解作: “邪道、歧途、堕入歧途”。^⑦ 笔者以为吐蕃贵族焉有取姓意含如是负面者, 因此 Ngan lam 可能并非吐蕃贵族原有的姓氏。

① 任小波《公元 763 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历史地理》第 33 辑, 上海, 2016 年, 第 114 页。

② H. E. Richardson, “Ministers of the Tibetan Kingdom”, *Tibet Journal*, No. 1. 1977. p. 20.

③ 杨质夫《藏汉小辞典》, 台北: 蒙藏委员会, 1976 年, 第 151 页。

④ 杨质夫《藏汉小辞典》, 第 151 页。

⑤ 杨质夫《藏汉小辞典》, 第 564 页。

⑥ 杨质夫《藏汉小辞典》, 第 151 页。

⑦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3 年, 第 648 页。

吾人查阅相关史籍，如《贤者喜宴》所著录《墀德松赞兴佛证盟诏书》中，参与兴佛盟誓的全体臣工之所属氏族，计有 32 支之多，然而并未存有恩兰氏（Ngan lam）之踪迹，^① 另于《贤者喜宴》所记载吐蕃十八采邑之中，享有采邑的 18 支氏族之中，亦无恩兰氏的踪影；^② 又如《贤者喜宴》与《五部遗教》所登载吐蕃军事建制各翼（ru）及各千户（stong sde）官员名录之中，恩兰氏族亦渺无踪迹。^③ 上述所提及各种职位、享有采邑的吐蕃氏族，总计有 70 支，并无恩兰氏族的存在。此是否意味着恩兰氏族属外来者，并非吐蕃本土固有的氏族，因而无法享有本土氏族应有的特权，与赞普王室所赐之恩典，必须极力争取立功的机会，以便获得赞普的赏识与恩赐，值得推敲。

（二）汉史籍载另名“马重英”之意义

就汉文史籍所载恩兰达札路恭拥有一汉式名称而言：《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于广德元年（763）以吐谷浑、党项羌之众二十余万，由李唐降将高晖引入李唐京师之后，提及立故邠王男广武王承宏为帝的吐蕃大将“马重英”之名。^④ 《资治通鉴》亦载：“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⑤ 上述汉文献所提及的马重英，即为代宗永泰元年（765）乘仆固怀恩叛唐之际，率领蕃军侵唐的吐蕃四大将领之一的马重英。^⑥ 比对蕃方文献敦煌古藏文卷子 B. M. Or. 8212（187）《吐蕃大事纪年》虎年（762）所载：

Zhang rgyal zigs // dang / Blon stag sgra dang Zhang stong rtsan dang Zhang / btsan ba las stsogs pas / Keng shir dra ma drangste Ke (Keng) shi phab // rGya rje bros // nas / rGya rje gsar du bcug / ^⑦

尚结息（Zhang rgyal zigs）、论达札（Blon stag sgra，即恩兰达札路恭）、尚东赞（Zhang stong rtsan）、尚赞磨（Zhang btsan ba）等引兵至京师，陷京师，李唐皇帝出逃，另立新的李唐皇帝。

上引文的 4 位将领之名，并未有汉史籍所录之“马重英”，其余 3 位皆同。因此，李方桂院士将蕃方文献所载之恩兰达札路恭，比定为汉籍所载之马重英，李方桂院士更尝试解释为何恩兰达札路恭另名为马重英。其以为恩兰达札路恭可能与夫蒙灵察一般，取姓

①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贤者喜宴》), 叶 129 上第 3 行, 至叶 130 下第 7 行。

②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贤者喜宴》), 叶 19 下第 3-5 行。

③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贤者喜宴》), 叶 20 上第 4 行至叶 20 下第 1 行。另见 G.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vol. 3.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9. pp. 737-738.

④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台北：鼎文书局，1980 年，第 5237 页。

⑤ [宋]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3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冬十月戊寅（初九）条，台北：逸舜出版社，1980 年，第 7151-7152 页。

⑥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第 5240 页记载：“吐蕃大将尚结息赞磨、尚息东赞、尚野息及马重英率二十万众至秦天界”，其中尚结息赞磨应为尚赞磨，尚息东赞即为尚东赞。

⑦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1978, 1979. B. M. Or. 8212 (187). pl. 594. 第 53-54 行。

马。李方桂院士举《旧唐书》卷一〇九《李嗣业传》所载，夫蒙灵察又为马灵察，夫蒙为羌部落人之名，因此恩兰达札路恭有可能属羌部落人，而取马姓。^① 笔者以为李方桂院士上述的推论，似值得进一步商榷，因为恩兰达札路恭另名马重英，与夫蒙灵察又为马灵察，二者同取“马”姓似相彷彿，但夫蒙灵察与恩兰达札路恭二人似乎不存有任何的相似性，因为第一，夫蒙灵察将原姓“夫蒙”改为“马”，保留原有名字的形式，明显与恩兰达札路恭另名“马重英”的形式完全不同，二者间似难“同理可证”；第二，恩兰达札路恭另有汉式名字“马重英”一事，有多种可能性，或有可能“马重英”为其本名，则其可能来自于中亚已信奉伊斯兰教取名为 Mahmet 或 Muhamud 者，进入中原后，取其原名第一音，再取“重英”为名，而成“马重英”，入蕃后再改用吐蕃姓氏名讳；或有可能其为早已进入中原之中亚人士，为方便与中原人士往返而取用汉式名字，而早为中原人士所熟知，故于效力于蕃廷后，虽已改名换姓，但仍为中原人士所熟知，故仍称其汉式名字“马重英”，而不名其蕃式姓名。

大陆朱悦梅教授则另持一说，其据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兰却加教授告知，谓“马重英”并非恩兰达札路恭的汉文名字，而是 rMa khrom (玛曲节度) 的汉语音译，朱教授据此以为恩兰达札路恭于公元 704 年前后驻玛曲节度统领吐蕃东道之军。^② 朱教授言下之意指恩兰达札路恭因此为唐人载为“马重英”。按此说早于 1982 年王尧于《吐蕃金石录》已言及“马重英”的藏文对音为 rMa grom。^③ 但笔者以为有所疑义，其一：恩兰达札路恭于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中，首次出现于公元 762 年，为攻占长安的蕃军将领之一，在此之前，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并未载及恩兰达札路恭之名，而且 704 年至 762 年，间隔了 58 年，似乎不太可能，而且朱教授未提任何依据，指恩兰达札路恭于公元 704 年前后驻于玛曲节度；其二：按 rMa khrom 或 rMa grom 与马重英之间的藏汉音转，应以唐代时期唐蕃汉蕃语之间的音转为准，不能以今音度之，因此 Khrom 的汉语音译，可能是“乞隆姆”或“克隆姆”，而非今音的“冲姆”；若以“马重英”以蕃语音译则为 ma jungꞑe，^④ 显然，“英ꞑe”韵母与 m 韵母并不吻合。更何况敌方边防重地机关名称，唐方将之误载或误解为人名，其无知如此，可能性极低矣。

另有大陆学者任小波重新解释了“马重英”的意思，提出马重英可能为藏文 rMa grom 的汉文音译，而 rMa grom 有二解，一为吐蕃位于青海地区接界李唐的边防机构之名称；二为据埋藏本古籍《五部遗教》所载吐蕃中翼“十六境域” (yul gru bcu drug) 之中，就有恩兰及彭域二地，就位于拉萨北边，是为恩兰氏族的领地，该地设有 rMa

① 详见 Fang Kuei Li, “Notes on Stag Sgra Klu Khong”, in Steinkellner, Ernst. eds.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1983. pp. 175-177.

② 朱悦梅《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使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47 页。

③ 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第 90 页。

④ 详见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56、201 页。

grom (马氏军镇) 因而得名; 而《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原始位址就在此, 即今拉萨北方的蔡公堂 (Tshal gung thang) 支村, 任氏综合上言以为: “马重英” 当即出自吐蕃本部又从黄河上游领兵东进并攻陷长安的 rMa grom (马氏军镇) 的译音; 恩兰达札路恭在汉文史籍中被称作 “马重英”, 盖因其曾担任彭域千户长, 亦即为马氏军镇统帅之职。^① 按恩兰达札路恭领军攻入长安的时间为公元 763 年, 事成后回蕃, 方受赞普赐赠彭域, 其氏族成员被永久赋与彭域千户长之职, 此于《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之第 41 行至 47 行有载:

sku srungs vphan yul bavi stong dpon du gzhan su yang myi gzbug par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 gi myes po gsas slebs gyi bu tsha rgyud peld las gang rngo thog pav / dmangs
vdrang ba gcig / sku srung vphan yul bavi stong dpon g-yung drung du stsald par gngang
ngo // ^②

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职, 永不授与他人, 论达札路恭之先祖色腊的子孙后代之中, 任何有一能力且能公正待民者, 永远授与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职。^③ 由上引碑铭所载即知, 并非如任氏所云恩兰达札路恭本身曾任彭域千户长, 而是恩兰达札路恭攻下长安回朝后, 蕃廷奖赏其家族成员之一, 授与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职, 恩兰达札路恭本身未曾担任过禁卫军彭域千户长, 这是任氏的误解, 此其一; 其二, 如任氏所云, 所谓 rMa grom 有二处, 其中一处位于吐蕃中翼之恩兰氏族的领地, 领地就称为 rMa grom, 任氏又将之视为 “马氏军镇”, 此似乎值得商榷, 因为按吐蕃的地方建制, 蕃廷于吐蕃本部地区设立翼 (Ru) 及千户 (sTong sde), 于军事占领区方设立 Khrom 或 Grom (军镇), 此已为中外学界之定论!^④ 如是, 于吐蕃本部的核心区中翼, 焉有设立 rMa grom “马氏军镇” 的可能? 更何况 rMa 氏确属吐蕃氏族之一, 怎可能与另一姓氏 Ngan lam 有所交互使用或混淆呢? 总之, 因恩兰达札路恭另有一汉式姓名, 更增其为非吐蕃本土固有氏族的可能性。

(三) 恩兰达札路恭原非佛教徒

就其宗教信仰而言: 羌部落的宗教属于萨满教, 较接近于吐蕃原有的本波 (Bon po), 因此在取用汉姓之时, 除非改宗伊斯兰教, 取用伊斯兰式之名, 否则衍用伊斯兰式的 “马” 姓之可能性极低; 据藏文史籍如《大臣遗教》《王统世系明鉴》《新红史》《拔协》《贤者喜宴》诸书, 均载达札路恭毁佛或信奉本波之事迹, 例如《王统世系明鉴》记载:

① 任小波《公元 763 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第 108-117 页。

②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正面碑铭第 41-47 行。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 第 66-67 页。

③ 译文参酌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 第 83 页, 并依原文文意对译文作部分更动。

④ 详见 Géza Uray, “KHROM: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9th Centuries.” Michael Aris & Aung san Suu Kyi (eds.),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es*, Oxford, 1979. Westminster: Aris & Phillips. pp. 310-318. 马德《KHROM 词义考》, 《中国藏学》1992 年第 2 期, 第 98-101 页。

国王 (墀松德赞) 虽喜爱佛法, 但是大臣玛尚仲巴杰与达扎路恭 (Ta ra klugong) 等人势大, 其余人不能对抗。^①

《新红史》则载:

王子墀松德赞十三岁继王位。大臣玛祥仲巴杰及达热禄恭 (rta ra klu gong) 等不喜佛法者权势甚大, ……^②

《贤者喜宴》记载:

当由汉人梅果 (rgya me mgo)、天竺阿年达 (rgya gar ava nanda) 及精通汉语者加以翻译。此三人在海波山 (has po ri) 的鸟穴内将佛典译成藏语。这时, 另外之大臣恩达刺路恭 (blon po ngam ta ra klu gong) 及舅臣 (ma zhang) 等等来到跟前, 说道: “你们三个勤奋人在那里做什么? 舅臣的小法有载: 人死如果做冥福, 定予只身流放; 不得奉行供养南方泥婆罗之神佛。这些你们没听到吗? 凡所行之诸多事务, 如与佛法言论相同者, 无需禀告于王, 即当埋于沙中, 然后以小法惩处。这是否还要辩论?” 于是, 对于此事, 整事大臣会议 (bkav yo gal vchos pavi mdun sa) 接到紧急信息……^③

上引三文之达扎路恭 (Ta ra klu gong)、达热禄恭 (rta ra klu gong)、恩达刺路恭 (Ngam ta ra klu gong), 指的就是恩兰达札路恭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只不过后世史籍将 Ngan lam 合为 Ngam, stag sgra 简化为 Ta ra 或 rta ra, khong 字则与 gong 字互通。上引三文显指恩兰达札路恭属反佛大臣之阵营, 与赞普在宗教上持对抗的态度。但究竟上述藏文史籍大部属公元十二世纪以后问世之“教法史籍”, 其内容或有荒诞不经, 可信度较低, 但某些情节的叙录, 似非空穴来风, 有其传承, 诚如王忠所云教法史料究竟出自藏族史家之手, 偶有所述, 或为故老相传, 或为亲见遗文遗物,^④ 不能忽略其重要性。笔者以为就其姓氏的藏文意义看来, 极有可能是因其来自于中亚的异教徒, 于吐蕃奉佛的赞普而言, 其所信奉之宗教相对于佛教之正道, 就是“歧途”或“导入歧途的恶道”, 由于其为外来者入仕于蕃廷, 立有大功, 遂赐与蕃式姓氏, 以代表具有异教意涵的 Ngan lam (歧途、恶道) 赐之, 表其所信之宗教异于佛教。就因为此姓, 遂为后世藏族史家误其为反佛者与赞普对抗, 于是创作出许多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情节, 用以表现佛教与本教之间在唐代吐蕃历史上的斗争与倾轧。

虽然恩兰达札路恭原非佛教徒, 然而, 墀松德赞赞普于公元 761 年下定决心奉佛, 至 779 年于甫完工之桑耶寺正殿, 召集王室与全体臣工发誓永世奉佛的誓文之中, 恩兰

① 萨迦·索南坚赞著, 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王统世系明鉴》,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164页。

② 班钦索南查巴著, 黄颢译《新红史》,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25页。

③ 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125页。笔者依《贤者喜宴》原文对译文作了部份调整。原文见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贤者喜宴》), 叶78下, 第3-6行。

④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 前言。

达札路恭赫然名列其中。^① 此正意味着恩兰达札路恭在赞普墀松德赞的强力推动佛教信仰运动下，为效忠赞普，最终亦屈服于赞普之拥佛政策，至晚于 779 年已改宗为佛教徒。

(四) 建议赞普攻取长安

就其建议赞普攻取长安一事而言：恩兰达札路恭曾参与吐蕃于公元 763 年攻占李唐长安的行动，此事件的来龙去脉，据约立于公元八世纪时期逻些布达拉宫前之《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有所记载：

btsan pho Khri srong lde brtsan thugs sgam lav bkav gros gyis rgya che bas / chab
srid gar mdzad do cog duvang legs ste / rGyavi khams su gtogs pavi yul dang mkhar mang
po bcom ste bsdus nas // rGya rje Hevu vgi wang te rje blon skrag ste / lo cig cing rtag du
dpya dar yug lnga khri phul te / rGya dpyav vjal du bcug go //^②

墀松德赞赞普智慧深远，又由于有大议会之广大咨询，在国事上有任何措置，无不良善，因此攻取甚多李唐所属土宇城池。唐王孝感皇帝（肃宗）君臣惊骇，每年持续地奉献 [吐蕃] 绢帛五万匹，订定为唐朝缴纳之赋税。^③

依上引文，唐肃宗为吐蕃侵犯领土事，允诺每年缴奉吐蕃绢帛五万匹，以求止息吐蕃之继续入侵。但随后事情有了变化，《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续载：

devi vog du / rGya rje yab Hevu vgi wang de grongs ste / rGya rje sras Wang peng
wang rgyal por zhugs nas / Bod la dpyav vjal du ma rung ste // btsan pho thugs snyung
bavi tshe Ngan lam klu khong gis // rGya yul gyi thild / rGya rjevi pho brang keng shir /
Bod gyis dmag drang bavi bkav gros gyi mgo chen po gsold nas keng shir drang bavi dmag
dpon chen phor //...^④

其后，李唐皇帝之父孝感皇帝（肃宗）驾崩，其皇子广平王（代宗）践位后，认为不宜向吐蕃缴纳贡赋，于赞普心中气愤之时，咨询以恩兰达札路恭为首的大议会，主张蕃军应攻取唐土的中心李唐皇帝的宫殿京师之后，任命攻打京师之大将军……^⑤

上引文指出唐肃宗驾崩，代宗继位后，不接受其父皇对吐蕃的承诺，而引起赞普的不满，遂由恩兰达札路恭为首的大议会提议赞普发兵直入京师。上述事件的内容及恩兰达

① 公元 779 年，墀松德赞于桑耶寺君臣盟誓，生生世世拥护佛教，立佛教为国教。当时参与盟誓的众相计有 9 位，分别为大论尚野息舒丁、论达札路恭（Blon stag sgra klu khong）、尚结赞拉囊、论杰札勒色、论赞热多雷、尚杰年达恭、论赤岗嘉恭、坚错赞、尚结赞列恭等。上文所列排名仅次于大论之后的论达札路恭，即为恩兰达札路恭。详见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f. 109. b. 第 4 行至 f. 110. a. 第 2 行。

②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 41-49 行。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76-77 页。

③ 译文参酌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84 页，以及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九十一，1989 年，第 159 页。并依原文意义作适当的调整。

④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 49-56 行。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77-78 页。

⑤ 译文参酌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84 页，并依原文文意对译文作部分更动。

札路恭所扮演的角色，让吾人忆起回纥登里可汗乘李唐国丧之际，率部众入唐的情景。即如《旧唐书·回纥传》所载：“九姓胡素属于回纥者，又陈中国便利以诱其心，可汗乃举国南下，将乘我丧。”^①《资治通鉴》则有较为详细且更为生动的记载，其云：

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②

上引文所指之“九姓胡附回纥者”，即为登里可汗身边的粟特胡策士，彼等劝进登里可汗利用李唐有丧，进寇李唐可有大利。亦即，恩兰达札路恭如同其他粟特胡一般，显然属长期与李唐有所互动，了解中国内情并晓知李唐政局的人士，因其有此方面的专长，为赞普所信任的“李唐通”，所以能向赞普提建言，怂恿赞普墀松德赞乘隙侵渔李唐。如此行径，与依附回纥之粟特胡如出一辙。而且要求李唐每年贡奉绢帛的主意，亦可能出自于恩兰达札路恭。从另一方面看，为何是由恩兰达札路恭倡议攻取长安？而非由常驻唐蕃边区，担任吐蕃东道节度使的尚赞摩 (Zhang btsan ba)，亦非当时的大论韦囊热达赞 (dBavs snang bzher zla brtsan)？此事似涉及其出身究为何族有关，因《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 25-26 行提及：rGyavi srid gyi nyam drod rtog cing (他了知李唐政局的败坏)，^③ 按理长驻唐蕃边区的尚赞摩应该是最清楚者，因为驻区最靠近李唐，其必须搜集敌情，经常呈报大论，如此应该是尚赞摩与大论韦囊热达赞最了解李唐内部的情况，为何是恩兰达札路恭？由此观之，恩兰达札路恭是否属于投靠吐蕃效忠于蕃廷的粟特胡？此可能性似乎值得斟酌再三，然因文献难征，缺乏直接证据，只能留待后日。

另一方面，吐蕃占领长安以后的举措，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

降将高晖引吐蕃入上都城，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男广武王承宏为帝，立年号，大赦，署置官员，寻以司封崔瓌等为相……吐蕃居城十五日退，……^④

《资治通鉴》则记载：

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⑤

按上二引文所载，值得斟酌再三者在于所有吐蕃在长安的作为，是由降于吐蕃之李唐泾州刺史高晖所主导，还是由马重英？此涉及吐蕃停留在长安短短十余日之中，竟然会想到为李唐另立朝廷的作法，究竟是预谋？抑或临时兴起，作即兴式的演出？依吐蕃攻取长安的动机，乃在于惩罚唐代宗，未兑现其父王向吐蕃年纳五万匹绢帛的承诺分析，吐蕃进入长安后的一系列行为，应属胸有成竹的可能性较大。降将高晖可能仅是属带路向

①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5《回纥传》，第 5208 页。

② [宋]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6 德宗建中元年 (780) 六月甲午朔条，第 7282 页。

③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 25-26 行。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74 页。

④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第 5237 页。

⑤ [宋]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3 唐代宗广德元年 (763) 冬十月戊寅条，第 7151-7152 页。

导的角色，因为按《实录》所载吐蕃系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庚午（初一日）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①准此，从十月初一至十月戊寅（初九日）吐蕃入长安城，共9天的时间，如此短暂时间，以吐蕃之作风，如何完全信任高晖？加上吐蕃甫入长安即着手进行另立“新唐廷”事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二件事：其一，为新任广武帝立新年号，即改元，此事只有中原人士方知其改朝换代的重大象征意义，是高晖所提议，抑或马重英所为？其二，李唐实施多相制，马重英竟也完全按李唐的体制，找出司封崔瓌、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亦即吾人可据以上所述分析，似乎吐蕃进入长安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另立“新唐廷”，对所有建立“新唐廷”的内容与程序，均了然于胸，方能于短时间内完成此事。由此方面分析，吐蕃主其事者马重英对李唐非得有足够的知识，否则就算有降将高晖于旁建议，也无法竟其功。

（五）因功受赏的特殊模式

就恩兰达札路恭因功受封赏的情形而言，按《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记载：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 dang / zla gong gi bu tsha rgyud gang nye ba gcig dngul gyi yi ge chen po g-yung drung du stsald par gnang ngo //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 gi pha zla gong gi bu tsha rgyud vpheld gyi rnam zhang lon yi ge pavi thang dang / dmag sum rgyar gnang ngo // sku srungs vphan yul bavi stong dpon du gzhan su yang myi gzhus par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 gi myes po gsas slebs gyi bu tsha rgyud peld las gang rngo thog pav / dmangs vdrang ba gcig / sku srung vphan yul bavi stong dpon g-yung drung du stsald par gnang ngo // ^②

论达札路恭与大公之子孙最近支脉之一，永久赐与大银字告身。论达札路恭之父大公之子子孙孙，均授予朝廷官员告身，并赐予三百军士。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职，永不授与他人，论达札路恭之先祖色腊的子孙后代之中，任何有一能力且能公正待民者，永远授与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职。^③

归纳上引文所载蕃廷对恩兰达札路恭家族的赏赐，包括授与大银字告身、赐予三百军士、封授禁卫军彭域千户长之职等。上述三项中的后二项，引起笔者的注意，原因在于吐蕃本土贵族均有属于自身的部落，当其出仕蕃廷之时，蕃廷按其官职授与告身，若立有大功者，则另授采邑与奴户，并保证不无罪剥夺任何土地财产等，^④少有提及像授与恩兰达札路恭家族兵丁与彭域（vphan yul）千户长的永久职务。例如因拥立有功，赞普墀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 797-815）赏赐僧相娘定埃增（Myang ting nge vdzin）

① 详见[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23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冬十月条所附《资治通鉴考异》之说明，第7150页。

②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正面碑铭第35-47行。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65-67页。

③ 译文参酌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83页，并依原文文意对译文作部分更动。

④ 详见松赞干布与韦氏家族盟誓的誓词。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3-165页。

诸项当中，提及 sdevi dpon po rgyud du gnang ba (赐与其世袭部落长一职)^①，原因就在于娘氏为吐蕃本土贵族，自有部落，无需赞普赐与兵丁，相较于由外地迁徙而来的外族如中亚地区家族等，就需要蕃廷的协助，包括赐与采邑土地，与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的军士等。由此点看恩兰氏族的来源，似乎与非吐蕃本土氏族有关。

有鉴于此，另有一重要证据，即吐蕃官员于蕃廷立有大功者，获得颁赐立碑，并撰刻铭文以记其事功之时，此碑均立于该有功官员所属氏族之原领地，也就是其家乡故里，以表彰其功勋，永传后世。例如前文所提及之僧相娘定埃增，其所获颁之石碑“谐拉康碑”，就坐落于拉萨河 (sKyid chu) 的上游区，即今拉萨东北墨竹工卡县止贡区宗雪公社第五生产队。^② 此处应即是娘定埃增所属娘氏 (Myang) 的领地，按敦煌古藏文卷子 P. T. 1286 《小王家臣及赞普世系表》所列，娘氏为垄若 (Klum rovi ya sum) 小王南巴布森帝 (Nam pavi bu gseng ti) 之家臣，^③ 其领地位于逻些城东北拉萨河的上游区，二者正是相同的地望，于此可见，大臣纪功石碑乃立于其所属领地，并非立于吐蕃首府逻些；又如吐蕃工布藩国国王与吐蕃赞普盟誓，誓后所立石碑，就立于工布地区，即今林芝县米瑞区广久公社第五生产队。^④ 由上述二例可确证，吐蕃立碑之习，系将石碑立于当事人的领地。由此看来，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立于逻些布达拉宫之前，正意味其为外来者，当时并未享有采邑领地，故立之于布达拉宫之前。事后，赞普再封赐恩兰氏族予彭域地区，按彭域 (vphan yul) 原为遭王室所灭岩波 (Ngas povi khra sum) 小王古止精波杰 (dGug grivi zing po rje) 之领地，现赐与恩兰氏族，显然恩兰氏族确为外来氏族，应信而有征。

然而，西方学者哈梭德 (Guntram Hazod) 于《古代西藏纪年：一本西藏最早历史之译注》一书中，论及有关《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原始位址的问题，其以蔡公堂支村的一座大型古墓、古代恩兰系地 (Ngan lam sri) 以及系长碑 (Sri rdo ring) 的故事为标题，进行简要论述，包括指认距拉萨北方 12 公里处的一座大古坟为恩兰达札路恭之墓、原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原位址于蔡公堂支村，系于 1693/94 年间由第五辈达赖喇嘛总管第悉桑结嘉错所命，移至今布达拉宫之前，连同一块无字碑叫内碑，雪碑就被称之为外碑，原内外二碑都应该在蔡公堂支村，原因在于此处就是恩兰氏族的采邑，另一采邑在彭域。^⑤ 另于该书页 216 解释吐蕃大事纪年中的一个词汇：新恩兰园 (Ngan lam tsal gsar pa)，此地原为赞旺 (btsan vbang) 氏族的领地，以此可证明恩兰氏族是属于赞

① 《谐拉康碑甲》西面碑铭第 42 行。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112 页。

②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115 页。

③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1978, 1979. PT. 1286. pl. 554. 第 14-15 行。

④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100 页。

⑤ 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Wein: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pp. 181-182.

旺六族 (btsan vbang rus drug) 群体中的一支。^① 笔者以为哈梭德以上论点多所疑义：第一，彭域是原拉萨河河谷地区地方势力古止森波杰 (dGug grivi zing po rje) 的领地，原非恩兰氏族固有的领地；第二，彼等称蔡公堂支村原是赞旺氏族的领地，但按赞旺藏文为 btsan vbang，意即赞普臣民，可能并非氏族之姓，因为笔者曾爬梳目前所能见及之吐蕃氏族姓氏，整理成“唐代吐蕃氏族一览表”，计有 114 支，^② 其中并无 btsan vbang；亦有可能是直属赞普王室的采邑，上述赞旺六族可能就是为王室照管经营王室采邑者的代称，有鉴于此，实有待进一步的考索；第三，恩兰氏的采邑均十分接近拉萨，是为赞普王室未崛起之前强劲对手森波杰的领地，恩兰氏族实际上并未列名于森波杰阵营之中。

再者，藏族学者江琼·索朗次仁以为 1434 年问世的《汉藏史集》载及 Phyi rdo ring (立于弃之长碑)，指的就是《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是为立于 Phyi (今音“弃”) 的石碑，Phyi 古音则为“庇”，与今日蔡公堂支 (Kri) 村之语音为 sPi (汉音译为“毕”)，二者发音相近；又今当地耆老亦言，相传该村有石碑“飞”至布达拉宫前的传说，依此，索朗次仁以为公元 1694 年由第五辈达赖的总管桑结嘉措 (Sang rgya rgya mtsho) 所命，将《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由蔡公堂支村移至布达拉宫之前；^③ 索朗次仁续考恩兰氏族的发祥地，认为依《第吴宗教源流》所载，恩兰氏族为吐蕃中翼十六将 (tshan) 之一，由此研判恩兰的领地位于中翼境内，境内又有山名为恩兰仲巴山 (Ngan lam gron pa ri)，境内又有一座大古坟，似应为恩兰达札路恭之墓，据上分析恩兰氏族之起源地就在蔡公堂支村。^④ 就以上江琼·索朗次仁的论点，姑不论以语音来识别古今之地名，或以地方的传说，作为根据来指认某事，是否为可靠踏实的方法；首先就应辨明究竟《五部遗教》所载的吐蕃中翼“十六境域” (yul gru bcu drug) 之中，就有恩兰及彭域二地的说法，与《第吴宗教源流》所载之恩兰氏族为吐蕃中翼十六将 (tshan) 之一的说法，究竟是同一？还是不同？恩兰是氏族姓氏、彭域是地名，而且二书所载的吐蕃地方建制是属何时？此攸关后续的论证；另《贤者喜宴》记载 vPhan yul stong sde sGro dang rMa yi yul^⑤ (彭域千户为卓氏与玛氏之地)。由上引文得知彭域似原为吐蕃氏族卓氏 (sGro) 与玛氏 (rMa) 的领地，赞普因恩兰达札路恭立功，将彭域转赐给恩兰氏，如是恩兰氏明显属于后来者，也就是外来者。再者，恩兰氏族所获包括彭域或蔡公堂支村的领地，乃恩兰达札路恭立功后，方由墀松德赞赞普封赐，如是，更能证实恩兰氏族并非吐蕃本土的氏族。

① 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p. 216.

②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台北：联经，2011年，第571-572页，表13：“唐代吐蕃氏族一览表”。

③ 江琼·索朗次仁《雪碑最初立碑位置考》，《西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38-39页。

④ 江琼·索朗次仁《雪碑最初立碑位置考》，第40-41页。

⑤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贤者喜宴》)，叶19下第4行。

三、吐蕃政教冲突中的恩兰达札路恭

恩兰达札路恭首次出现于吐蕃文献载记之中，且具确切时间者，为敦煌古藏文卷子 B. M. 8212 (187) 《吐蕃大事纪年》于虎年 (762) 冬末所载，参与攻陷李唐京师之役。^①但实际上，其于公元 762 年之前早已出现于吐蕃政坛。据《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 1-20 行记载：

btsan pho Khri lde gtsug rtsan gyi ring lav // Ngan lam klu khong gis // glo ba nye bavi rje blas byas pa // vBal ldong tsab dang / Lang myes zigs / blon po chen pho byed byed pa las / glo ba rings nas // btsan pho yab Khri lde gtsug rtsan gyi sku la dard te dgong du gshegs so // btsan pho sras Khri srong lde brtsan gyi sku la ni dard du nye // Bod mgo nag povi srid ni vkhrug du byed pa las / klu khong gis vBal dang Lang glo ba rings pavi gtan gtsigs // btsan pho sras Khri srong lde brtsan kyi snyen du gsold nas vBal dang Lang glo ba rings / bden par gyurd te khong ta ni bkyon phab ste // klu khong glo ba nyevo^②

于墀德祖赞赞普之时，恩兰路恭尽忠职守。末东查与朗聂息正担任众相，心生叛逆之后，危害赞普父王墀德祖赞御体致使殒命冥天，赞普子墀松德赞御体亦差点遭到伤害，并扰乱吐蕃民政。路恭揭发末氏及朗氏叛逆之证据，启奏赞普子墀松德赞，证实末氏及朗氏之反叛，将彼等治罪，路恭忠心耿耿。^③

据上引碑铭揭示了吐蕃史上弑杀赞普父子的一桩疑案，以及恩兰达札路恭于此疑案中扮演的角色。但碑铭并未显示此疑案发生的时间。据敦煌古藏文卷子 B. M. Or. 8212 (187) 《吐蕃大事纪年》羊年 (755) 记载：

Yab gyi khor pha dag dmag myis phab /.../ Lang vBal gyi bran spyugste / mtong sod du bton /.../ Lang vBal bkyon pab pevi nor brtsis par...^④

对于上引古藏文，各家理解不同。王尧、陈践二氏于 1992 年原译为：“以兵力捕杀谋害

① 《资治通鉴》于唐代宗广德元年 (763) 的冬季十月戊寅 (初九) 记载蕃军攻入长安，至十月庚寅 (二十一) 撤出长安，此即吐蕃攻占李唐京师 13 天，吐蕃武功最辉煌的一页。但《吐蕃大事纪年》却将此事载于公元 762 年的冬季项下，与汉史料所载相差一年。此处应以汉史料所载时间为准，详见第 7151-7153 页。

②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72-73 页。

③ 译文语词说明如下：glo ba nye bavi rje blas byas pa 中之 rje blas，采李方桂、柯蔚南二氏之主张，为“职责、任务”之意，因此语意为“执行忠心的职责”，此意正好以“尽忠职守”表达，恰如其分。blon po chen po 以“众相”译之，乃因 vBal ldong tsab 时任首席宰相，Lang myes zigs 任宰相同平章事，因此以“众相”加以涵盖。Bod mgo nag povi srid ni vkhrug du byed pa las，王尧氏译之为“蕃境黔首庶政大乱”，但因 vkhrug (骚乱、扰乱) 为名词，du 介系词，byed pa (作、制造) 为动词，故整句应是某人或某事扰乱吐蕃民政。详见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第 154-157 页。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84 页。

④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B. M. 8212 (187) pl. 592. 第 12-13 行、16 行。

父王之元凶……迁出末氏、朗氏之奴户，令二人偿命。……清点朗氏末氏获罪遣者之财产……”^① 后于2008年改译为：“以兵力捕杀谋害父王之元凶……迁出末氏、朗氏之奴户，驱至董索（mtong sod）。……清点朗氏末氏获罪遣者之财产……”^② 黄布凡、马德二氏译为：“士兵捕获一伙（刺杀）父王之近侍。……逐朗氏与末氏之奴隶，驱赶至东碎。……没收遭罪遣者之财产……”^③ 道特森氏（Brandon Dotson）则译为：The soldiers sacked the father's entourage. ...They banished the bondservants of Lang and 'Bal; they sent them to Mtong-sod. ...They calculated (confiscated) the wealth of the disgraced Lang and vBal. ...^④（士兵袭击了父王之随员……彼等驱逐了朗氏与末氏之奴隶，将之驱赶至Mtong-sod。……彼等计算或没收遭贬黜的朗氏与末氏之财产。……）按上引古藏文之khor pha，在今日辞书解为“眷属”，^⑤ 但此处之词义不可能作如是解，而khor zug有周围、四周之意，^⑥ 是以khor pha应解作“四周或周围之人”，黄布凡、马德二氏与道特森氏译之为“近侍”或“随员”，较近于原意。原文之phab为动词vbebs之完成式，有“放倒、降下、贬抑”之意，^⑦ 因此黄布凡、马德二氏与道特森氏所翻译者，较符合原文之意义。就上引公元755年的纪事而言，似为前任赞普墀德祖赞遇弑后，现任赞普墀松德赞处理父王遇弑事件的后续情况，包括追究父王身边的侍从，驱逐朗、末二氏的奴户等。李唐方面亦获得蕃方通报，于玄宗天宝十四载（755）记录云：“赞普乞黎苏笼猎赞死，大臣立其子婆悉笼猎赞为主，复为赞普。”^⑧ 汉史籍所载赞普号虽有误，^⑨ 但印证蕃方的记录，证实公元755年吐蕃确实发生赞普位的更迭，只是唐方并未获得蕃廷发生赞普遇弑，吐蕃内部动荡的情资。于此吾人可确定公元754-755年间，吐蕃赞普墀德祖赞遭到弑杀殒命。此命案发生的原因、过程，以及为何是由一位出自非吐蕃本土氏族的官员检举命案元凶等，各方史籍均失载，仅能以当时吐蕃的政教状况作为背景，以及后代藏族史家所撰史籍之载记当中，捕捉蛛丝马迹。

按吐蕃内部的纷争，主要仍出自于宗教信仰的问题。此于墀松德赞于发布的兴佛证盟第二诏书（bkav gtsigs gnyis pa）之中，^⑩ 有很清楚的表述。其述及吐蕃奉行佛教的历史云：

btsan po bzhi mes khri srong btsan gyi ring la / ra savi bi har brtsigs te sangs rgyas

①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55页。

②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③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④ 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p. 128.

⑤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第245页。

⑥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第245页。

⑦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第1974页。

⑧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第5236页。

⑨ 按上引《旧唐书》所载二位赞普名号皆有误。“乞黎苏笼猎赞”之“乞黎”藏文对音为khri，“苏笼”为srong之对音，“猎赞”为lde btsan之对音，合为Khri srong lde btsan，此应对于755年登基的墀松德赞赞普名号。“婆悉笼猎赞”则有类srong lde btsan之对音，亦指墀松德赞。墀松德赞父王墀德祖赞（Khri lde gtsug btsan）于汉史料则译之为“弃隶踏赞”。

⑩ 详见dPav bo gtsug lagv phreng ba, op. cit. 叶110上第3行至叶111下第3行。

kyi chos thog ma mdzad tshun chad / btsan po yab Khri lde gtsug brtsan gyi ring la / Brag dmar gyi kwa chur gtsug lag khang brtsigs te sangs rgyas kyi chos mdzad phand chad gdun rabs lnga lon ngo //①

于四代赞普先祖墀松赞 (松赞干布) 之时, 建造了逻些贝哈尔寺 (ra savi bi har 大昭寺), 开始奉行佛法以来, 至赞普父王墀德祖赞之时, 建造了红岩嘎丘寺 (Brag dmar gyi kwa chur gtsug lag khang), 奉行佛法已达五代矣。

上引文显示吐蕃王室建造佛寺, 信奉佛教的情况, 这仅只属于吐蕃宫廷的信仰, 王室无法将佛教信仰推广于宫廷之外, 墀松德赞于兴佛证盟第二诏书述说其原因如下:

de na Bod kyi chos rnying pa ma lags la / sku lha gsol pa dang cho ga myi mthun pas / kun kyang ma legs su ngogs te / la la ni sku la dmar yang ngogs / la la ni chab srid gong gis kyang ngogs / la la ni mi nad phyugs nad byung gis kyang ngogs / la la ni mu ge lang bab kyis kyang ngogs so...②

于此, 由于 (指佛教) 对于吐蕃之古老教法不善, 与敬奉生命神之仪轨不相符合, 因此, 众人疑 (佛法) 不善, 有人疑其会不利于身, 有人担忧其会造成政权衰落, 有人顾虑其会使人疫畜病, 有人怀疑其会招致灾荒飢饉。③

基于以上原因, 吐蕃某些大臣反对王室的佛教信仰, 墀松德赞续于第二诏书叙述云:

btsan po yab dgung du gshegs kyi vog du zhang blon kha cig gis hur vduns kyi blo zhig phyung ste / yab myes kyi ring tshund chad / sangs rgyas kyi chos mdzad pa yang bshig go / de nas yang snyad ni lho bal gyi lha dang chos Bod yul du bgyi bavi myi rigs shes / gzhan yang phyind chad bgyid tu mi gnang bar bkav khriims bris so /④

父王赞普归天之后, 某些大臣居心叵测, 毁弃历代先祖以来所奉行之佛法。然后又借口南方蛮貊之神社与教法不宜行之于吐蕃, 继而立下以后不得奉行 (佛法) 之法令。⑤

墀松德赞之父墀德祖赞遇弑于公元 754-755 年之间, 墀松德赞于 755 年继位为赞普, 理当掌握大权, 焉有放任 “某些大臣”, 不但毁弃历代王室先祖所奉行之佛法, 且立法禁佛。由于吐蕃传世文献难征, 无法得知上述 “某些大臣” 指涉何人? 然而后代教法史籍却有所记载, 吾人试举较为常用的三种教法史籍为例, 说明如下:

《贤者喜宴》引《拔协》云:

父王墀德祖赞 63 岁时, 因在羊卓巴园 (Ya vbrog sba tshal) 赛马而死。是时,

① dPav bo gtsug lagv phreng ba, op. cit. 叶 110 上, 第 4-5 行。

②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叶 110 下, 第 2-3 行。

③ 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第 185 页。笔者依《贤者喜宴》原文对译文作了部分调整。

④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叶 110 上, 第 6-7 行。

⑤ 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第 184 页。笔者依《贤者喜宴》原文对译文作了部分调整。

王子随即执政，但尚未成年，因此，舅臣玛祥仲巴杰（Zhang blon Ma zhang grom pa skye）说道：“王之寿短，乃系推行佛法之故，遂不吉祥。所谓后世可获转生，此乃妄语。消除此时之灾，当以本教行之。谁推行佛法，便将其孤身流放边地。”并制订了“小法”（khrims bu chung）。^①

《西藏王统记》记载：

rgyal po chos la dgav navang / blon po ma zhang khron pa skyes dang / sTag ra klu gong la sogs dbang ches pas / gzhan gyis rgol ma nus so / ^②

王虽喜佛法，但因大臣玛祥仲巴杰（Ma zhang khron pa skyes）及达札路恭（sTag ra klu gong）等人权势极大，谁都无能敌也。

第五辈达赖所著之《西藏王臣史》则载曰：

Ma zhang sogs kyis rgyal po sku tshe thung ba dang bkra mi shis pa chos kyis lan pas chos byar med pavi khrims bcas te / shūkyā mu ni rgya yul du skyel bavi thabs byas kyang ma theg par sa vog tu sbas / vphrul snang du bshas ra byas / ^③

玛祥等人将赞普短寿及不祥之事，均借口说是奉佛法所遭到的恶报，遂订定废佛的法律，也将从汉地运来的释迦牟尼佛像埋进地下，将拉萨神变寺也改成屠宰场。

综合上列三则引文的内容，回应了“某些大臣”为何人的问题，是为“权势极大，谁都无能敌”的舅臣玛祥仲巴杰（Zhang blon ma zhang grom pa skye）及达札路恭（sTag ra klu gong），而且是为信奉本教的大臣。有关上述教法史籍所载，站在当时吐蕃所实施的政治制度而言，乃绝无可能的情事。笔者说明如下：

按吐蕃原实施独相制，就如同汉史料所记载：“置大论以统理国事”^④、“事无大小，必出于宰相便宜从事。”^⑤吐蕃大论乃实际执掌国事者，遂有噶尔氏家族成员揽政达50年的往例，吐蕃为革除大论揽权的弊端，于公元701年开始将独相制改造成群相制，亦即任命三至十余位大臣为chab srid kyī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宰相同平章事），以瓜分大论的权力，共同议决国事。^⑥从此吐蕃政坛上难再有如禄东赞、赞业多布、论钦陵等三位大论般的浩大权势，可独自裁决国事。由此观之，教法史籍所载的“权势极大，谁都无能敌的舅臣玛祥仲巴杰（Zhang blon ma zhang grom pa skye）及达札路恭

① 原文见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f. 75a. 第7行至 f. 75b. 第1-2行。译文见黄颢译注《〈贤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摘译（五）》，《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第57页。

② Sa skya bsod nams rgyal mtshan, rGyal rabs gsal bavi me long. (《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03-202页。)

③ rGyal dbang lnga pa chen mos brtsams pa, Bod kyī deb ther dpyid kyī rgyal movi glu dbyangs. (《西藏王臣记》，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54页。)

④ [唐]杜佑《通典》卷190《边防六·西戎二·吐蕃》，第1023页。

⑤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第4985页。

⑥ 林冠群《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第234-242页。

(sTag ra klu gong)”，乃出现于公元 755 年以后，距离吐蕃实施群相制已超过五十余年，吐蕃焉有可能再度出现如独相时期般之独断乾坤的大臣？

吾人复由墀松德赞于公元 755 年即位，年仅 13-14 岁的角度观之，由于年纪仍轻，裁决国政之权仍不免旁落于“某些大臣”。按当时吐蕃体制，能够统理国事者，当然是由首席宰相所领衔的宰相会议，吾人可覆核玛祥仲巴杰与达札路恭是否担任当时的首席宰相以及名列当时群相之中，即可断定上引教法史籍所载之正误。

由于吐蕃传世文献对于吐蕃各朝所任命的群相阙载，仅能就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的载记之中，爬梳何人分摊了吐蕃大论的原有职权，包括代表赞普召集并主持吐蕃各地盟会；率领军队征伐四方，以执行向外扩张政策；主掌外交事务，代表赞普出使外邦；代表赞普与外邦媾和；厘定租税，前往吐蕃各地征收税赋、清点人口（大料集）；^① 裁决行政及司法案件等等。^② 由此即可查对出当时究竟有那些人担任群相的职务。兹根据敦煌古藏文卷子 B. M. 8212 (187) 《吐蕃大事纪年》所载，公元 755-763 年之间分担了大论职权者，制表如下（表 1）：

表 1 公元 754-763 年间吐蕃群相任职表

年代	姓名	所担任工作	累计众相人数
755 年	论弃桑雅卜拉 (Blon khri bzang yab lag)、尚东赞 (Zhang stong rtsan)	攻陷洮州城堡	2
755 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 (Blon khri sgra stag tshab)、论芒赞彭冈 (Blon mang rtsan vphan gang)、论多热 (Blon mdo bzher)	主持堞麦夏盟	5
755 年	琛尚结息舒丁 (mChims zhang rgyal zigs shu teng)	主持冬盟	6
756 年	论结桑甲贡 (Blon skyes bzang rgyal kong)	主持夏盟	7
756 年	论弃桑雅卜拉、尚东赞	攻陷嵩州	7
756 年	论结桑甲贡、野达墀恭 (rGyal ta khri gong)	主持冬盟	8
756 年	论弃桑雅卜拉	主持堞麦夏盟	8
756 年	论曩热达赞 (Blon snang bzher zla brtsan)	主持堞麦冬盟	9
757 年	大论曩热 (Blon chen po snang bzher)、尚结息。论结桑甲贡任副大论多年后身亡。	主持夏盟	8
757 年	尚东赞、论芒赞彭冈	主持堞麦夏盟	8

① 林冠群《唐代吐蕃的相制》，载《唐代吐蕃史论集》，第 172-175 页。

② 林冠群《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第 128、193-195 页。

年代	姓名	所担任工作	累计众相人数
757年	论芒赞彭冈、论多热	主持琛麦冬盟	8
757年	大论曩热	攻陷大宗喀及临洮城	8
758年	尚东赞	主持琛麦夏盟	8
758年	论弃桑雅卜拉、论结桑达囊 (Blon skyes bzang stag snang)	引兵至凉州城	9
759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论多热	主持琛麦夏盟	9
759年	论结桑达囊	主持冬盟	9
759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	主持琛麦冬盟	9
759年	论弃桑雅卜拉、尚东赞、尚赞磨 (摩) (Zhang btsan ba)	攻陷小宗喀	10
760年	大论曩热	主持夏盟	10
760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论曩热赞恭 (Blon nang bzher rtsang khong)	主持琛麦夏盟	11
761年	论结桑达囊	攻陷巴高、交乡二城	11
761年	尚东赞	攻陷松州、桑格尔	11
762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	主持琛麦冬盟	11
762年	尚结息、论达札路恭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尚东赞、尚赞磨	攻陷李唐京师	12
762年	尚结息舒丁	主持大会盟	12
763年	论绮力思札达则	主持琛麦夏盟	12
763年	任命论弃桑 (Blon khri bzang) 为大论		12

据上表所示, 公元 755-763 年间吐蕃曾担任群相者计有论弃桑雅卜拉 (Blon khri bzang yab lag)、尚东赞 (Zhang stong rtsan)、论绮力思札达则 (Blon khri sgra stag tshab)、论芒赞彭冈 (Blon mang rtsan vphan gang)、论多热 (Blon mdo bzher)、琛尚结息舒丁 (mChims zhang rgyal zigs shu teng)、论结桑甲贡 (Blon skyes bzang rgyal kong)、野达墀恭 (rGyal ta khri gong)、论曩热达赞 (Blon snang bzher zla brtsan)、论结桑达囊

(Blon skyes bzang stag snang)、尚赞磨(摩)(Zhang btsan ba)、论囊热赞恭(Blon nang bzher rtsang khong)、论达札路恭(Blon stag sgra klu khong)等,共计13位。其中于755年原任首席宰相末东查因谋叛遭治罪去职后,首席宰相一职由论囊热达赞(Blon snang bzher zla brtsan)接任,至763年则改由论弃桑雅卜拉(Blon khri bzang yab lag)接任。

吾人查阅上述755-763年间担任首席宰相与群相名单,即可发现教法史籍所载之“权势极大,谁都无能敌的舅臣玛祥仲巴杰(Zhang blon ma zhang grom pa skye)”,并未列名其中,如是何来“权势极大,谁都无能敌”?另位达札路恭(sTag ra klu gong)则可能就是762年方列位群相的论达札路恭(Blon stag sgra klu khong)。准上,吾人可确定教法史籍所载“某些大臣”就是“舅臣玛祥仲巴杰(Zhang blon ma zhang grom pa skye)及达札路恭(sTag ra klu gong)”等人,确为错误的记载。“某些大臣”应该就是当时担任首席宰相的论囊热达赞(Blon snang bzher zla brtsan),及其所领衔宰相会议中超过半数以上的群相,因为当时只有实际掌政的首席宰相及宰相会议,方能越过未成年赞普的意志而订定禁佛法律。恩兰达札路恭迟至762年方挤进群相行列,并未参与群相制定禁佛法律的行动,无法证明其为反佛阵营的一员。

然而,吾人是否察觉到墀德祖赞遇弑、揪出及处置凶手以后,紧接着首席宰相与宰相会议违反赞普意志,订立禁佛法律,此一连串事件之间,是否意味着赞普的遇弑,与反佛行动有所关联?按推动佛教信仰为历代吐蕃赞普的既定方针,吐蕃历经松赞干布、贡松贡赞、芒伦芒赞、都松芒保杰、墀德祖赞等五代赞普都无法如愿,就是因为朝中有大臣反对。据《拔协》的记载,墀德祖赞曾发现藏在琛浦(mChims phu)仓库中的先祖松赞干布遗诏,其上写道:当我之子孙后代名字中有“德”(lde)字之赞普时,佛教将出现等。墀德祖赞见此文后想到:此名中有“德”(lde)字者,应该就是我。^①于是决定追随先祖遗志,提倡佛教。墀德祖赞着手弘佛事宜,包括派人前往印度求法;遣使者往冈底斯山迎回数部佛经;并建造五座神殿存放供养佛经;^②邀请译师翻译佛教经典,将汉文本《金光明最胜大乘经》《毘奈耶分别品》译成藏文;^③于札玛(Brag dmar)建噶丘寺、于琛浦建神殿等。墀德祖赞还自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萨毗(Tshal byi),迎回遭到阏国驱逐的一批佛僧,于逻些城建造七座大寺供养这批于阏僧侣,吐蕃境内之佛教活动因而大增,^④引起信奉本教的贵族及大臣的疑惧,激发彼等之危机感。为挽救彼等之危局,于是进行了一场反佛的阴谋,试图从根刨除佛教在吐蕃的所有的生机,一举去除醉心于弘佛的现任赞普、拥佛的宰相以及一切从事佛教信仰的活动,并控制尚未成年的继位赞普等。遂有上文所述赞普遇弑,首席宰相末东查、群相朗聂息遭举

① R. A. Stein, *Une chronique de bsam-yas: sBa bžed*, Paris, 1961, p. 1.

②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f. 71. a. 第3-4行。

③ 第五世达赖喇嘛著《西藏王臣记》(藏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50页。

④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 London. 1935-1951. pp. 80-83.

发为元凶，受到惩治，并立下禁佛法律等之情事。^①

就整体墀德祖赞遇弑事件而言，恩兰达札路恭当时虽非群相，但据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左面碑铭记载：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 / nang blon chen po dang yo gal vchos pa chen por / bkav
stsald kyis kyang / bkav lung dang vdra bar rje blas dkav dgu nyamsu blangs te phyi nang
gnyis gyi chab srid khab so dpend pa dang che chung gnyis la drang zhing snyoms te /
Bod mgo nag povi srid la phan pa legs dgu byas so //^②

论达札路恭受命为大内臣兼首席司法大臣，其顺从赞普诏命，历经许多艰困之
职责，贡献于内外政务等国事，处理大小事均正义且公正，对于吐蕃民政作了许多
有益且良善的作为。^③

就上引文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墀德祖赞遭弑之时，恩兰达札路恭所担任的官职：nang blon
chen po dang yo gal vchos pa chen po。王尧氏认为此官为“大内相平章政事”^④，但“平
章政事”是群相的官称，恩兰达札路恭当时并非群相，显然有误，而且 yo gal vchos pa
之 yo 为“弯曲、歪斜”之意，yo gal pa 意为“矛盾”，vchos pa 有“修正、改正”之
意，^⑤所以《新唐书》译之为“整事大臣”，“整事”就是“整饰”，类似唐朝进言直谏
的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的官职。^⑥吾人观上引左面碑铭所载 che chung gnyis la drang
zhing snyoms...byas so（处理大小事均正义且公正），指的正是其担任类似唐朝进言直谏
的御史大夫或谏议大夫，并负有审判罪犯之司法官职的形象写照。由身兼首席司法大臣
的恩兰达札路恭揭发命案及凶手，并绳之以法，似乎是再自然不过了。但实际上，在赞
普遇弑与举发凶手之间有个重要联结，即既能去除现任赞普，同时又能拔除赞普所信任
的首号大臣，将弑杀现任赞普的元凶，指向赞普所重用的宠臣，如此一来，就将现有拥
佛的权力核心一举而摧毁殆尽。执行此重要环节任务之人，云其非吐蕃反佛阵营的一
员，谁能相信？而且此人必为该阵营相当重要的一员。

职是之故，恩兰达札路恭以其非吐蕃本土氏族以及非佛教徒的身份，不但参与了反
佛的行动，且为反佛阵营中执行反佛计划的核心人物之一。

① 详见林冠群《玛祥仲巴杰与恩兰达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统建立前的政教纷争》，《唐代吐蕃史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23-327页。

②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71页。

③ 译文参酌 H. 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Hertford, 1985, p. 5. 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第152页。笔者并依原文作部分调整。

④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83页。李方桂、柯蔚南二氏则疑之为 Great Administrative Officer（大行政官），理查逊氏则只音译，并未译出。详见 H. 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p. 5. 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第152页。

⑤ 陈楠《吐蕃职官制度考论》，第90-91页。

⑥ 陈楠《吐蕃职官制度考论》，第90-91页。

四、唐蕃关系中的恩兰达札路恭

(一) 安史乱期间的恩兰达札路恭

正当吐蕃政情汹涌，国内动荡之际，李唐亦于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爆发安史之乱，蕃唐内部俱生巨变。吐蕃一方迅即控制局势，其原因在于反佛阵营乃依预谋，有条不紊地按步骤执行，包括弑杀原任赞普，嫁祸并惩治原任赞普所宠信之宰相，控制未成年的新任赞普，立下禁止佛教信仰的法律等，一切都在反佛势力掌控之中。然而，李唐于安禄山举起反叛的大旗之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李唐内部几乎全面崩坏，朝廷无力独自处理反叛势力，为避免叛军直入关中，拿下二京，遂调回原戍守西北之边军勤王，造成与吐蕃接界的边防空虚，给予吐蕃入侵可乘之机。隔年，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吐蕃即连陷李唐之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以上诸军辖于陇右节度使，约今青海湖之东与东北地区），以及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今青海同仁县境）以及嵩州（今西昌）等地；^① 至德二载（757）十月陷西平；^② 乾元元年（758）陷河源军（今青海西宁附近）；^③ 上元元年（760）陷临洮西之神策军及廓州（约今青海贵德、化隆西一带）；^④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七月吐蕃入大震关，攻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陇右之地。^⑤

对于吐蕃乘李唐内乱，于公元 755-763 年间入侵李唐之情形，吐蕃方面的记载如何？据敦煌古藏文卷子 B. M. 8212 (187) 《吐蕃大事纪年》所载，^⑥ 制表如下（表 2）：

表 2 《吐蕃大事纪年》所载 755-763 年侵唐表

年代	侵唐蕃将名讳	攻打唐境名称
755 年	1. Blon khri bzang dang Zhang stong rtsan 论弃桑与尚东赞 2. 不明	1. Mkhar tevu cu phab 陷洮州城 2. tevu cur dra ma drangste 攻打洮州
756 年	Blon khri bzang dang Zhang stong rtsan dang Kag la bong 论弃桑与尚东赞与阁逻凤	Se cu phab 陷嵩州

①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19 肃宗至德元载（756）十二月是岁条，第 7011 页。另见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B. M. Or. 8212 (187) pl. 592. 第 21-22 行。

②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0 肃宗至德二载（757）十月，第 7038 页。

③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0 肃宗乾元元年（758）是岁条，第 7066 页。

④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1 肃宗上元元年（760）八月条、是岁条，第 7096、7102 页。

⑤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3 代宗广德元年（763）七月，第 7146 页。

⑥ 藏文部分详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 109-111 页；译文部分参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 155-156 页。

年代	侵唐蕃将名讳	攻打唐境名称
757年	Blon chen po sNang bzher las stsogs pas 大论曩热等	rGyavi mkhar tsong ka chen po dang Seg shing kun 陷李唐之鄯州城(西平)及制胜军 ^①
758年	Blon khri bzang dang sKyes bzang stag snang las stsogs pas 论弃桑与结桑达囊等	Khar tsan leng cu 攻打凉州城
759年	Blon khri bzang dang Zhang stong rtsan dang Zhang btsan ba 论弃桑、尚东赞与尚赞磨	Tsong ka chungu phab 陷小宗喀 ^②
761年	1, Blon skyes bzang las stsogs pas 论结桑等 2, Zhang stong rtsan 尚东赞	1, Khar tsan ba go dang Kevu shan gnyis phab 陷凉州巴高及交河县 2, Zong cu dang Zangs kar gnyis phab 陷松州及桑噶尔 ^③
762年	1, Zhang rgyal zigs dang Zhang stong rtsan las stsogs pas 尚结息与尚东赞等 2, Zhang rgyal zigs dang Blon stag sgra dang Zhang stong rtsan dang Zhang btsan ba las stsogs pas 尚结息、论达札、尚东赞与尚赞磨等	1, Bum ling lcag zam rgal te Dra cen drang ste vBu shing kun dang Zin cu dang Ga cu las stsogs pa rGyavi mkhar mang pho phab 越凤林铁桥, 攻陷临洮军、成州、河州等众多李唐城池 ^④ 2, Keng shir dra ma drangste Ke shi phab 攻打李唐京师, 攻陷京师 ^⑤

吾人比较上述唐蕃双方对于755-763年间,吐蕃侵唐的过程,唐方对失陷土地之地名与失陷时间,记载较详,但对蕃方历次战役的领军者阙载;而蕃方对所攻陷的唐境地名及攻陷时间,记载较为不详,但补阙了历次战役的领军将领名讳。此使吾人得以藉唐蕃双方载记的比较,找出恩兰达札路恭在侵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有吐蕃碑刻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所载,亦为最直接的史料,不可或缺。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亦记载,恩兰达札路恭于755-763年期间对唐之举措。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21-41行记载:

Btsan pho Khri srong lde brtsan gyi ring la // Ngan lam klu khong glo ba nye ba la

① 此处王尧、陈践二氏译作“大宗喀与临洮城”;黄布凡、马德二氏译为“鄯州与制胜军”;道特森氏于注释中采他人见解为“河源军与绥戎军”。按:公元757年汉史料载西平失陷,西平即为鄯州城。另王尧、陈践二氏于其1992年、2008年大作之《吐蕃大事纪年》录文中,均将Seg shing kun误读为Peg shing kun,又将Peg shing kun与762年打下的vBu shing kun相混淆,故造成其解读之困扰。比较上述三者之理解,黄布凡、马德二氏所译较为合理,故采用之。详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31、109、155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56页,另见该书编年史之人名、地名、事件笺证部分,第119页;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p. 130.

② 小宗喀今青海湟源县一带,疑为唐代河源军所在。

③ 黄布凡、马德二氏以为此地名与松州(治所在今松潘)并提,可能离今松潘不远。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120页。

④ 详见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57、121页。

⑤ 《资治通鉴》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的冬季十月戊寅(初九)(第7151-7153页)记载蕃军攻入长安,至十月庚寅(二十一日)撤出长安。但《吐蕃大事纪年》却将此事载于公元762年的冬季项下,显然有误。

bkav gros che nas / thugs brtand te // Nang blon bkav la gtogs par bcug nas // rGyavi
srid gyi nyam drod rtog cing / khar tsan phyogs su thog ma drangs pavi / dmag dpon du /
bkav stsald gyis kyang / dgrav thabs mkhas la gros gyis song de / rGyavi khams su gtogs
pavi Va zha dang po bsdu / rGya las mnangs phal sa cha bcad pas / rGya spa gong ste //
rGyavi khams su gtogs pa dByar mo thang / xxxxxxx na dang / Tsong ka phyogs xxxxxx
dang nas las stsogs pa xxxxxxx ng pho gcald / klu khong gis xxxxxv vkhrugs pavi dgra
xxxxxx chab srid chen pho mdzad xxxxxx bkav gros chen pho gsold xxxx glo ba nye zhing
chab srid la dpend pavi sems dkav ba byas so //...^①

于墀松德赞赞普之时，恩兰路恭忠心耿耿，赞普经咨询大议会后，决定任命其为内臣同平章事。他了知李唐政局的败坏，受命为首征凉州之将军，在其精于克敌之术指挥之下，首将居于唐境的吐谷浑打下，砍除了李唐对该地的大部份权势，李唐为之惊恐。于李唐境内的雅摩塘……以及宗喀方面，……等地区……以及麦等等，缴出许多贡赋，路恭……混乱的敌人……他做出了杰出的统治^②……他请求大议会……忠心且执行了对国家有益的艰巨任务。^③

依上引碑铭所载，恩兰达札路恭于惩治弑杀赞普父王元凶以后，因功而官职获得提升为 Nang blon bkav la gtogs pa，汉译为“内臣同平章事”，意即以内臣的官位加衔“同平章事” (bkav la gtogs pa) 而成为群相。观上引碑铭所载任群相时之作为，包括了对赞普提供李唐内部政情的咨询、领兵对外作战等，凡此均属群相职权。然而，其身份仍是群相中地位最低者，因为其他群相官称一律为 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 “宰相同平章事”的情况下，其以僚案级官员“内臣” (nang blon) 的身份加衔方式，挤入群相行例，情况相当特殊。

依上引碑铭，其任群相后所负担的第一项任务，为 khar tsan phyogs su thog ma

①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 21-41 行。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73-76 页。另见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第 143-145 页。H. E. Richardson, *A Corpus on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pp. 8-10. 三者录文有歧异处，以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所录为准。

② 此处碑铭为：chab srid chen pho mdzad，王尧氏译作“利于社稷”，理查逊氏译为：great dominion (杰出的统治)，李方桂与柯蔚南二氏则译为：made a great government (建立一大政府)。按此处碑铭乃置于叙述恩兰征讨凉州过程中，打下了唐境内的吐谷浑、雅摩塘以及宗喀方面其他地区之后，因此对于此句的理解，笔者以为对于征服以后之地区必须妥为善后，以免管理未妥，而有后顾之忧，是以理查逊氏与李方桂、柯蔚南二氏所译较近于碑铭原意。笔者采用理查逊氏之译法。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84 页；H. E. Richardson, *A Corpus on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Hertford. 1985. p. 13. 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第 159 页。

③ 译文系参阅理查逊氏 (H. E. Richardson)、李方桂、柯蔚南二氏及王尧氏等诸家之翻译，再加上笔者个人见解而成。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 36 行所载：xxng pho gcald /各家译法不同，王尧氏译作：“开始纳贡”；理查逊氏 (H. E. Richardson) 译为：many (taxes) were paid (缴纳许多贡赋)；李方桂则单译为：“传扬”。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84 页；H. E. Richardson, *A Corpus on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Hertford. 1985. pp. 9-13；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第 158-159 页。

drangs pavi / dmag dpon du / bkav stsald gyis kyang “受命为首征凉州之将军”。^①但以此比表2所列攻打凉州事，系于公元758年，亦即恩兰达札路恭于755年为王室护驾立功后，隔3年方受命攻打凉州，而且其非主帅，主帅为表2所列之论弃桑（Blon khri bzang）与论结桑达囊（Blon skyes bzang stag snang），其中论弃桑全名为 Blon khri bzang yab lag，于763年接任为首席宰相。（请见表1末栏）由此研判，恩兰达札路恭由于“了知李唐政局的败坏”，以及“精于克敌之术”，其于征讨大军之中所担任的工作，可能是供主帅咨询的“参谋长”之类的职能，而非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战将。

吾人观表2“吐蕃大事纪年”所列，自755-762年间，吐蕃历次领军侵唐的将领，亦即就是吐蕃的群相，计有：论弃桑、尚东赞、大论曩热、论结桑达囊、尚赞磨、尚结息等6位，其中参与历次战役频率最高者为尚东赞5次，其次为论弃桑4次，而恩兰达札路恭并未列名其中。直到攻入长安之役，方见恩兰达札路恭之名，而且排名于主帅尚结息之后，于尚东赞、尚赞磨之前，名列第二。上述现象似乎说明了一件事，恩兰达札路恭似非吐蕃于755-762年间攻打李唐的要角，要角是为上述的6位群相。然而，直到攻打长安一事上，恩兰达札路恭方正式妆扮出台，有关于此，势需论及吐蕃为何兴兵攻打长安，及其攻打长安的来龙去脉，方能理解恩兰达札路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蕃军进占长安究竟纯系偶然抑或必然？

（二）蕃军进占长安系偶然抑或必然

据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41-49行记载：

btsan pho Khri srong lde brtsan thugs sgams lav bkav gros gyi rgya che bas / chab srid gar mdzad do cog duvang legs ste / rGyavi khams su gtogs pavi yul dang mkhar mang po bcom ste bsdus nas // rGya rje Hevu vgi wang te rje blon skrag ste / lo cig cing rtag du dpya dar yug lnga khri phul te / rGya dpyav vjal du bcug go //^②

墀松德赞智慧深远，又由于有大议会之广大咨询，在国事上有任何措置，无不良善，因此攻取甚多李唐所属土宇城池。唐王孝感皇帝（肃宗）君臣惊骇，每年持续地奉献绢帛五万匹，订定为缴纳之唐赋税。^③

上引碑铭所载，为蕃方记录唐肃宗君臣因畏惧吐蕃连番攻陷唐土，为让吐蕃停止继续肆虐，同意每年支付吐蕃5万匹绢帛。但唐方之允诺每年呈奉绢帛一事，究发生于何年？碑铭并未提及，此可从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49-52行的记载，推敲而出。其载云：

① 大陆学者任小波氏于其大作中以为上引蕃文中之 khar tsan phyogs su thog ma drangs pavi / dmag dpon 文意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确有其见地。但漏失了上引蕃文中之 thog ma（初、首、始、开头），即为首次、首度之意。原意应为：“首度攻打凉州之将军”。至于元帅则另有其人，据敦煌古藏文卷子 B. M. 8212（187）《吐蕃大事纪年》所载为论弃桑与结桑达囊二人。详见任小波《公元763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第115页。

②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南面（背面）碑铭第41-49行。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76-77页。

③ 译文参酌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84页，以及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第159页。并依原文意义作适当的调整。

devi vog du / rGya rje yab Hevu vgi wang de grongs ste / rGya rje sras Wang peng wang rgyal por zhugs nas / Bod la dpyav vjal du ma rung ste //...^①

其后，李唐皇帝之父孝感皇帝（肃宗）驾崩，其皇子广平王（代宗）践位后，认为不宜向吐蕃缴纳贡赋，……

据上引文称肃宗崩后，代宗不愿履行其父王对吐蕃之承诺。按肃宗崩于宝应元年（762）四月丁卯，2天后代宗即位。^②吐蕃于来年（763）七月大寇河陇，陷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尽有李唐陇右之地。^③九月寇泾州，十月寇唐畿。按既然肃宗已允诺吐蕃每年缴交汉缯，而且依照敦煌古藏文卷子 B. M. Or8212（187）《吐蕃大事纪年》虎年（762）所载：

mDo smad gyi dgun vdun / gTser blon khri sgra stag tshab gyi bsdus / rGya vi dpodar / mo phyogsu / stong dpon yan cad bya sgar stsald //^④

多思麻之冬季会盟于“则”地，由论绮力思札达则召集，以唐人岁输之绢缯分赐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员。^⑤

上引文明确记载李唐所“岁输”的绢缯，确实送到吐蕃手里，而且吐蕃相当于汉地州县级地方长官以上的官员，皆获有蕃廷颁赠唐人所献的绢缯。由此可确证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所载唐廷每年缴付吐蕃五万匹汉缯，系千真万确的事实。只是向外邦纳贡这种丧失天可汗之尊，极为屈辱的情事，李唐史官为顾及朝廷颜面予以阙略。

究竟肃宗于何时同意向吐蕃纳贡？《资治通鉴》记载吐蕃曾于肃宗宝应元年（762）正月，再度遣使请和。^⑥《新唐书·吐蕃传》则记载：“吐蕃使数来请和，帝虽审其谲，姑务纾患，乃诏宰相郭子仪、萧华、裴遵庆与盟。”^⑦，其中“帝虽审其谲，姑务纾患”之意为：肃宗虽然了解吐蕃并非真心请和，但为了能舒缓吐蕃边患，只有接受吐蕃所提的一切条件。《旧唐书·吐蕃传》记其事云：

肃宗元年建寅月甲辰（宝应元年正月），吐蕃遣使来朝请和，敕宰相郭子仪、萧华、裴遵庆等于中书设宴。将诣光宅寺为盟誓，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之事，请明日须于鸿胪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礼。从之。^⑧

上述三则汉史料所载，均未述明唐蕃双方议盟之内容，但《旧唐书·吐蕃传》却清楚地记载双方慎重盟誓的过程。此意味着唐蕃双方之间似有重大的约定，此约定正是蕃方所记载的李唐同意每年贡奉吐蕃五万匹汉缯，如是方有向佛寺盟誓，同时又于鸿胪寺采

①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 49-52 行。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 77-78 页。

②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0《肃宗本纪》，第 263 页。

③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1《代宗本纪》，第 271、273 页。

④ Ariane Spanien & Yoshio Imaeda, op. cit. B. M. Or. 8212 (187). pl. 593. 第 48-49 行。

⑤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 156 页。

⑥ [宋]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2 肃宗宝应元年（762）建寅月（正月）甲辰条，第 7118 页。

⑦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216 上《吐蕃传上》，第 6087 页。

⑧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第 5236-5237 页。

三牲血歃盟之需要。吾人于此似可确定肃宗于公元762年正月同意向吐蕃纳贡后，接着迅即将汉缯五万匹运送至吐蕃，一则表现出信守承诺的决心，以安吐蕃之心，一则亦寄望吐蕃遵守盟约，停止入侵唐境。

然而，唐代宗于762年四月登基后，于广德元年（763）四月派遣散骑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伦出使吐蕃，遭到扣留。^①唐使遭扣显示唐蕃关系已然生变，至于为何遭扣的原因，汉史料并未记载。按唐使李之芳等于四月出发，七月应已抵达蕃京逻些，向蕃廷递交国书并禀报此行的目的，但随即遭到扣留，紧接着吐蕃采取军事行动，至该年七月已攻入大震关，双方关系生变的原因，就是上文所述之代宗拒绝履行其父王之承诺。蕃廷对于代宗违反盟约的反应，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有所记载，其云：

btsan pho thugs snyung bavi tshe Ngan lam klu khong gis // rGya yul gyi thild / rGya rjevi pho brang keng shir / Bod gyis dmag drang bavi bkav gros gyi mgo chen po gsold nas keng shir drang bavi dmag dpon chen phor // Zhang mChims rgyal zigs shu theng dang //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 gnyis / bkav stsald te / keng shir drangs nas //...^②

于赞普心中气愤之时，咨询以恩兰达札路恭为首的大议会，主张蕃军应攻取唐土的中心李唐皇帝的宫殿京师之后，赞普任命尚琛结息许丁与论达札路恭二人为攻取京师的大将军，率军进攻京师之后……^③

吐蕃碑铭所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吐蕃进取李唐京师长安的原因，就是新任的李唐皇帝违反盟约，为惩罚背盟遂出兵直取李唐京师。换言之，吐蕃之入长安并非偶然机会，而是一种兴师问罪之举，是为赞普经过蕃廷廷议后所作的决策，系为有计划、有决心的举措。任小波氏主张：“当时唐朝军政之废弛、长安陷落之迅疾，恐怕亦在吐蕃赞普、将帅意料之外。”^④因而认为王忠氏之“吐蕃得入长安，纯系偶然机会”的说法，“似亦有其考量”。^⑤笔者以为此说未妥，原因在于唐使李之芳大约于763年七月抵蕃告知不再贡奉汉缯，嵬松德赞立即扣留唐使，并召开廷议，决议攻取长安，以报复李唐新政权之背盟。吐蕃从763年七月展开进取长安的军事行动，据《旧唐书·代宗本纪》所载该年七月吐蕃就已攻入大震关，九月八日方下泾州，而泾州之攻克，还是泾州刺史投降所致，至十月二日方寇奉天、武功、盩厔。^⑥此意味着吐蕃从大震关经泾州至京畿，花

①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第5237页。另见[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20代宗广德元年（763）四月辛丑条，第7143页。

②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第49-59行。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77-79页。

③ 此处王尧氏译作：“值赞普心中不怿之时，恩兰达恭乃首倡兴兵入唐，深取京师之议，赞普遂以尚琛野息书通与论达札路恭二人为攻京师之统军元帅，直趋京师……”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84页。上述译文如“首倡兴兵入唐，深取京师之议”与原文 rGya yul gyi thild / rGya rjevi pho brang keng shir / Bod gyis dmag drang bavi bkav gros gyi mgo chen po gsold 本义有所出入。至今仍有未察而继续袭用者，似有未妥。详见任小波《公元763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第114页。

④ 任小波《公元763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第114页。

⑤ 任小波《公元763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第114页。

⑥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第273页。

费大约 2-3 个月, 代表李唐并非毫无招架之力, 关键就在于吐蕃早已下定决心对唐采取“犁庭扫穴”。更何况李唐“军政之废弛”情况, 早已是吐蕃周知之情事, “吐蕃赞普、将帅”实无需讶异! 就因吐蕃主政大臣早知李唐内部的混乱, 方才达成直取长安的共识。如是, 吐蕃之入长安为偶然机会否?

(三) 恩兰达札路恭深谙李唐之道

另一蕃方传世史料敦煌古藏文卷子 B. M. Or. 8212 (187) 《吐蕃大事纪年》, 于虎年 (肃宗宝应元年, 762) 之载记, 对吐蕃攻入长安之原因与过程亦有所说明。其载:

…dgun smad rGya rje nongs nas // rGya rje gsar du bcug pa // dbyav dar dang sa ris las stsogs pa vbul du ma rung nas // chab srid zhig nas Zhang rgyal zigs dang Zhang stong rtsan las stsogs / pas / bum ling lcag zam rgal te // dra cen drang ste / vBu shing kun dang Zin cu dang Ga cu las stsogs pa / rGyavi mkhar mang pho phab ste / Zhang rgyal zigs slar Bod yul / du / mchis te / Zhang rgyal zigs // dang / Blon stag sgra dang Zhang stong rtsan dang Zhang / btsan ba las stsogs pas / Keng shir dra ma drangste Ke (Keng) shi phab // rGya rje bros // nas / rGya rje gsar du bcug / nas / dra ma / slar log nas //…^①

下半冬, 唐皇帝驾崩后, 新皇帝登基, 以向 (吐蕃) 贡奉丝绸及土地等为不宜而毁约后。尚结息 (Zhang rgyal zigs) 与尚东赞 (Zhang stong rtsan) 等越凤林铁桥, 率大军攻克武胜军、成州、河州等众多李唐城池。尚结息返回吐蕃本土。尚结息、论达札 (Blon stag sgra, 即恩兰达札路恭)、尚东赞、尚赞磨 (Zhang btsan ba) 等引兵至京师, 陷京师, 李唐皇帝出逃, 另立新的李唐皇帝。大军撤回。^②

上引古藏文纪事, 有三处值得注意, 其一: 为 dbyav dar dang sa ris las stsogs pa vbul du ma rung nas // 一句中之 sa ris 一词, 王尧、陈践以及黄布凡、马德等理解为“土地”,^③ 但国外学者如道特森氏则译为“地图”。^④ 勿论 sa ris 作“土地”或“地图”之解, 都意味着唐廷承认吐蕃拥有历年来攻占李唐失陷土地的主权。《吐蕃大事纪年》上载, 正可补《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与汉史料之阙漏; 其二: 代宗毁约后, 吐蕃执行惩罚李唐之军事行动, 主要由尚结息 (Zhang rgyal zigs) 与尚东赞 (Zhang stong rtsan) 二人负责, 而非恩兰达札路恭; 其三: 记载于征讨李唐战役途中, “尚结息返回吐蕃本土”, 此意味着蕃廷召开大议会 (即廷议), 将战场主帅尚结息召回, 参与蕃廷的廷议, 待议决后, 随即由尚结息率领恩兰达札路恭、尚东赞、尚赞磨等群相执行任务,

①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B. M. Or. 8212 (187) . pl. 593-594. 第 48-55 行。

② 译文参酌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第 57 页, 并依原文将译文作部分更动。

③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第 156 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第 57 页。

④ Brandon Dotson, op. cit. p. 132. 另张怡芬氏所编之《藏汉大辞典》中, sa ris 亦作“地图”一义。详见《藏汉大辞典》, 第 2909 页。

攻入长安。由上述显示，恩兰达札路恭虽曾于758年参与吐蕃首次征讨凉州之战役，但事实上，其于755-762年间仍大部份待在蕃廷，供赞普于处理对唐事务时之咨询。

吐蕃攻下长安城后，汉史料记载恩兰达札路恭之名为“马重英”，以及其进入长安城后之作为，已于上文述明，此处不拟赘述，唯恩兰达札路恭建议吐蕃攻取长安，以及占领长安城后，于13天的占领期间，为唐朝立新皇帝、改元、大赦、署置百官、任命群相等作法，都显示其为熟谙李唐事务的“李唐通”。毋怪乎，汉史料于载记吐蕃进入长安以后，未载吐蕃其他将领包括主帅尚结息之名讳，唯独只记载“吐蕃大将马重英”之名。汉史料之载记印证《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所载，在在意味着恩兰达札路恭于代宗广德元年（763），主导了整起吐蕃攻取长安，并为唐朝建立傀儡朝廷的事件。

吾人省视吐蕃进占长安、建立唐朝傀儡朝廷一事，正意味着当时以李唐天子为核心的中华天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因为代表李唐中华天下秩序的最高权位者天子，为避入侵之蕃军而自京师出亡，竟遭到恩兰达札路恭予以撤换，换言之，即吐蕃不承认未履行盟约的现任李唐天子，而另立李唐天子。如此一来不就证明当时吐蕃是以上国之姿，对下国不当行为的处置。吐蕃攻陷长安事件所呈现的意义，在于吐蕃所主导的天下秩序压过了李唐所主导的天下秩序，就如同盛唐时期李唐对诸外蕃的作法，若彼等违反天下法而失礼，则李唐以兵犁其庭、扫其穴，甚至更换其统治者，以作为惩罚，具相同之意义。^① 上述就证明了整起事件的主导者恩兰达札路恭，确实理解“中华天下秩序”的内涵与操作，将李唐视同吐蕃天下的属国，以李唐素来对待“失礼”属国的作法处置李唐。于此，吾人谓恩兰达札路恭深谙李唐之道，谁曰不宜。

（四）恩兰达札路恭属蕃唐关系中之鹰派人物

吐蕃攻占李唐京师之部众，于广德元年（763）自长安撤出后，并未调回吐蕃本部，而是屯聚于原、会、成、渭等，邻近唐蕃边界陇坻不远之诸地，^② 随时伺机进犯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李唐仆射、大宁郡王仆固怀恩被逼而反，首度引回纥、吐蕃十万众来犯京畿。^③ 此次仆固所引吐蕃部众，恩兰达札路恭是否参与其中，史未明言，不得而知。代宗永泰元年（765）仆固怀恩卷土重来，二度举兵叛唐，《资治通鉴》载其事云：

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俱入寇，令吐蕃大将尚结悉赞磨、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项帅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吐谷浑、奴刺之众自西道趣盩厔，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④

上引文之“吐蕃大将尚结悉赞磨、马重英等”，应为尚结息、尚赞磨、马重英等。另《旧唐书·吐蕃传》则记载参与李唐叛军之吐蕃部众将领为：“尚结息赞磨、尚息东赞、

① 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第396页。

②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元年（763）十一月壬寅条，第7157页。

③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二年（764）八月条，第7166页。

④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23代宗永泰元年（765）九月庚寅朔条，第7176页。

尚野息及马重英”，^①《旧唐书》之记载“尚结息赞磨”，就是“尚赞磨”；“尚息东赞”系因蕃文 Zhang stong rtsan 中 stong，于古藏文之上加音 sa 亦发音，故译音作“尚息东赞”，与尚东赞同一；“尚野息”即为 Zhang rgyal zigs 之译音，同于“尚结息”；“马重英”就是恩兰达札路恭。如是，攻取长安的吐蕃四大将领再度汇集，利用仆固怀恩叛唐之际，领军再度入侵唐境，李唐京师震撼。自永泰元年（765）九月一日起，至怀恩姪仆固名臣于闰十月降唐止，仆固怀恩叛唐事件落幕，蕃军肆虐唐境近 2 个月后退回蕃界。

吾人观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吐蕃近乎比年寇略李唐，此时吐蕃是由尚结息出任首席宰相之时期，尚结息全名为琛尚结息舒丁（mChims zhang rgyal zigs shu teng），系为吐蕃攻陷李唐京师的统帅，可谓经常参与对唐作战的鹰派人物。当时恩兰达札路恭亦可能于首席宰相尚结息鹰派作风的领导下，经常领兵对唐作战，例如《新唐书·吐蕃传》记载：

〔大历〕十三年（778），虜大酋马重英以四万骑寇灵州，塞汉、御史、尚书三渠以扰屯田，为朔方留后常谦光所逐，重英残盐、庆而去。乃南合南诏众二十万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时天子已发幽州兵驰拒，虜大奔破。^②

依上引文所载，恩兰达札路恭系执行战略性的任务，攻击李唐三处水渠，干扰灵州的屯田，事后再蹂躏盐、庆二州。接着再与南诏联军攻打位于川边的茂、扶、文、黎、雅等州，足迹自北而南，十分活跃。特别是恩兰达札路恭所负责与南诏联军攻打茂、扶、文等诸州一事，虽未载及此事所发生的时间，但却与唐德宗试图改变对蕃政策有所关联。

唐德宗于公元 779 年五月癸亥即位以后，立即改变对蕃政策，亟力争取吐蕃为与国而对蕃亲善。同年八月乙巳，命集代宗时期所羁留的吐蕃使者及俘虏 500 人，各赐袈衣，由韦伦携往吐蕃，表达与吐蕃改善关系的意愿。^③然而，吐蕃于德宗登基当年（779）之十月初一，即已发动十万众分三路进寇李唐剑南，^④据《旧唐书·吐蕃传》所载，当时堀松德赞所发三路军分别为：北路攻击李唐之灵武；东路进击李唐山南道之扶、文二州；东南路则进袭李唐剑南道，大军朝灌口进发。^⑤《旧唐书》此处所载吐蕃三路军有往击灵武者，可能有误。^⑥《资治通鉴》则有不同的记载，其于大历十四年（779）十月初一记载：

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

①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 下《吐蕃传》，第 5240 页。

②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216 下《吐蕃传下》，第 6092 页。

③ [宋]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6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八月乙巳条，第 7268 页。

④ [宋]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6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冬十月丁酉朔条，第 7270 页。

⑤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 下《吐蕃传》，第 5245 页。

⑥ 《旧唐书·吐蕃传》所载，系为吐蕃赞普堀松德赞与唐使韦伦之间的对话。众所皆知，吐蕃君臣均极擅长于外交辞令，对于涉及李唐的相关事务，皆可能以夸大的方式描述，堀松德赞为强调吐蕃军事行动的庞大与夸耀战力，作了夸张的叙述，声言蕃军分北、东、东南三路进攻李唐。堀松德赞所言，奥妙处在于吐蕃实际上并未于北路发兵往袭灵武，因此其巧妙地作了一个人情给李唐，云“今灵武之师，闻命辄已”，作为对于李唐破天荒的首度主动请和，一种友好的回应。《资治通鉴》则是如实地记载吐蕃与南诏联军，分三路进击李唐。详见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第 436-437 页。

“吾欲取蜀为东府。”^①

笔者以为《资治通鉴》如实地记载了吐蕃与南诏联军，分三路进击李唐。因为若与南诏联军，当然是以蜀地为目标，不可能远及于千里以外的灵武。而且所攻击的目标，与《新唐书·吐蕃传》所载恩兰达札路恭所负责与南诏联军一事完全符合。

对于德宗主动约和的诚意，吐蕃有所回应，也因此配合李唐进行双方关系的改善。唐蕃双方开始酝酿和盟，以终止双方的战争状态。双方频繁互派使节，洽商和盟事宜，不意蕃方竟有大臣反对，《旧唐书·吐蕃传》载其事云：

[建中三年(782)]九月，和蕃使、殿中少监、兼御史中丞崔汉衡与蕃使区颊赞至。时吐蕃大相尚结息忍而好杀，以尝覆败于剑南，思刷其耻，不肯约和。其次相尚结赞有材略，因言于赞普，请定界明约，以息边人。赞普然之，竟以结赞代结息为大相……^②

上引文所载显示，反对与唐和盟的大臣为时任首席宰相的尚结息，反对的原因是因其生性残暴，且曾于剑南遭到李唐反击而溃败，因此反对和盟。上引《旧唐书·吐蕃传》所载看似毫无疑问的吐蕃内情，但实际上却是张冠李戴。

按敦煌古藏文卷子 P. T. 1287《吐蕃赞普传记第二》所载，墀松德赞时期有 6 任首席宰相（大论），依任期先后分别为：韦囊热达赞（dBavs snang bzher zla brtsan）、管墀桑雅卜拉（mGos khri bzang yab lag）、琛尚结息舒丁（mChims zhang rgyal zigs shu teng）、恩兰达札路恭（Ngan lam stag sgra klu gong）、那囊尚结赞拉囊（sNa nam zhang rgyal tshan lha snang）、没卢乞力徐然夏（vBro khri gzu ram shags）等。^③另《贤者喜宴》Ja 章所著录公元 779 年墀松德赞兴佛证盟诏书之中，有共同起誓之大小臣工名单，该名单中众相依序排列有：大论尚结息舒丁（Blon chen po zhang rgyal gzigs shu ther）、论达札路恭（Blon stag sgra klu gong）、尚结赞拉囊（Zhang rgyal tshan lha snang）等等。^④在上引二则吐蕃传世史料的相互印证下，于琛尚结息舒丁与那囊尚结赞拉囊之间，事实上存有一任首席宰相恩兰达札路恭，而且尚结息于公元 779 年时仍任首席宰相。至建中三年（782），亦即上引《旧唐书·吐蕃传》所载者，为吐蕃撤换首席宰相（即大论）的原因与经过，撤换首席宰相的时间应于公元 782 年，因为主和的尚结赞于建中四年（783）正月初十日已与唐陇右节度使张镒盟于清水，^⑤于此吾人可确定尚结赞确定至少于 783 年年初以前已接任首席宰相，按吐蕃对于会盟一事极为挑剔，有关会盟各种细节，以及盟誓誓词、盟誓方式、边界的订定等，均需双方使节来回奔波，传递意见协商等，在在都需要一段不算短的沟通与筹备时间。是以吐蕃于公元 779 年至 782 年更换了 2 位

①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6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冬十月丁酉朔条，第 7270 页。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 下《吐蕃传》，第 5246 页。

③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op. cit. P. T. 1287. pl. 561. 第 112-116 行。

④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叶 109 下，第 4-5 行。

⑤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28 建中四年（783）正月丁亥条，第 7338 页。

大论，其一为尚结息，另一则为恩兰达札路恭。而《旧唐书·吐蕃传》所载漏失了尚结息与尚结赞之任职大论之间，仍有一位任期短暂的恩兰达札路恭。亦即尚结赞所取代大论职位的对象，应为恩兰达札路恭，而非尚结息。^① 准上，汉史料每载及吐蕃内情时，不是挂一漏万，就是张冠李戴，良有以也。

不过上引《旧唐书·吐蕃传》所载之内容，也点出了恩兰达札路恭的作风，事实上亦同于尚结息，亦属对唐强硬的鹰派人物。其于汉史料载记“马重英”之名，经常参与唐蕃战争，例如《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记载其攻凉州，陷唐属吐谷浑部，并陷长安；^② 并二度助仆固怀恩叛唐等；且于大历十三年（778）袭灵、盐、庆等州。^③ 恩兰达札路恭实际率军参与了大历十四年（779）之蕃诏联军，分三路进袭剑南，据《资治通鉴》记载蕃诏联军受到唐军痛击云：

初，马璘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邠、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军，自江油趣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④

上引文所载为唐蕃之间的一次重要战役，关系着尔后唐蕃之间于剑南边界形势优劣的转变，以及吐蕃与南诏之间联盟的松动等。此战役蕃诏联军连吃败仗，结果造成蕃诏联军伤亡惨重。此役蕃军主帅恩兰达札路恭颜面尽失，因此记恨于心，是以不愿同意与唐约和，而于公元782年遭到急欲与李唐立盟的赞普，解除其首席宰相的职位，由尚结赞接任。从此恩兰达札路恭之名消失于蕃汉史料之中，不复载其相关事迹。

五、后代史籍中的恩兰达札路恭

吐蕃王朝可谓为藏族历史长河中之黄金岁月，威震全亚，叱咤二百余年。但在赞普王室与大臣贵族之间，佛教与本教之间，交织斗争倾轧之下，吐蕃王朝于公元九世纪下半叶以后崩溃，社会崩解，辉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原本墀松德赞于779年定佛教为国教以后，历经三朝，以朝廷之力广为弘扬，遍建

① 以上详见林冠群《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第277-279页。

② 详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84页。

③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己亥、七月辛未条，第7251、7252页。

④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26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冬十月丁酉朔条，第7270页。

寺院，鼓励出家，译经造佛，广邀大德等。^①佛教僧侣因而获得崇高的地位，受到朝廷与民间的供养，不事生产，专业弘法修行。然而，历经吐蕃王室百年来的全力支持，佛法得以兴盛，于民间弘传，但因王室分裂，王朝崩溃，使得原有的政治社会支撑佛教的力量崩解，导致佛法中衰，无以为继。如此促使佛教寺院关闭荒废，僧人四散且大部还俗，大隐于民间，最后甚至佛法绝迹于吐蕃本部，而进入彼等所谓的黑暗时期。^②

时至公元十世纪后半期，已在吐蕃民间扎根的佛教，再度兴起。不同于吐蕃王朝时期是以朝廷之力推动，再兴的佛教已是民间自发的信仰，佛教寺院与僧侣成为维系吐蕃社会、安定吐蕃社会的一股力量。特别是佛教僧侣，因为彼等为当时吐蕃社会中稀有的识文之人，于是取代了原有吐蕃王朝史官的位置，掌握了写史之权。众所周知，佛教僧侣著史系基于使佛教更为发扬光大，以叙述佛教弘通经过为中心，引用佛教教义立证，站在信仰之角度看历史的进展，^③是为以所谓的僧院式史观或唯宗教史观写史。其写史之架构，是以大乘佛教的编辑模式：即历史事件充满了奇迹及灵异，事实与想象、神话传说纠缠不清，^④疏略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社会等俗世事务，且大部份不说明引用资料出处，不列参考书目，^⑤没有确切纪年等。在如是著史的模式，以及认为所谓的历史不关涉到宗教，那还有什么价值可言的概念下，唐代吐蕃王朝的历史在彼等手中，成为一部佛教弘通的过程史，与佛教如何战胜横逆的斗争史。其中墀松德赞从其父王遭弑，冲龄即位，推动佛教信仰受阻，至排除层层阻碍，到成功立佛教为国教止，就成为彼等最佳著史的题材。

本文以记载分量较伙的《拔协》(sBa bzhed)^⑥为主，辅以其他藏文史籍诸如《贤

① 落蕃后为吐蕃赞普所任用的原李唐河西观察判官王锡，其于呈奏墀松德赞的第二道表章中，描述墀松德赞奉佛的一些作法云：“伏见赞普罄诚节竭身力，或澄心而妙一禅定，或发惠而广译真经，更建立伽蓝，雕刻素像，交驰驿使，请德僧徒…虽修塔建寺，邀诸僧尼，写经设斋，运泥造佛……”详见[法]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280-282页。

② 吾人观整部藏族历史的发展，摆脱不了厚重的宗教色彩。以唐代吐蕃历史演进而言，明为赞普王室与贵族之间的利得争斗，实为在地蕃教与外来佛教之间的缠斗。甚且吐蕃王朝的崩溃，也与宗教信仰以及宗教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有关。继吐蕃之后，历经一段四百余年没有中央政府存在的所谓“黑暗时期”，以藏人的眼光目之，所谓“黑暗时期”，是因教法不行于世的结果。详见 Helmut Hoffman, Early and medieval Tibet,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1990. pp. 392-393. 另见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第13页。

③ 林传芳《西藏佛教史料的特质与种类》，《狮子吼》第9卷第9期，台北，1970年，第24页。

④ A. I. Vostrikov, op. cit. p. 59. G.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p. 140.

⑤ A. I. Vostrikov, op. cit. p. 60.

⑥ R. A. Stein, *Une chronique ancienne de bsam-nyas : sBa bzhed*, Paris, 1961. 《拔协》为墀松德赞时期的拔色囊、拔桑希及其他人所写的桑耶寺编年史。以后受僧侣、赞普及大论之篡改及抄录，形成三部份，因而无法找出原本。现存之《拔协》，则为 sBa bzhed shabs btags ma (《拔协补篇》) 手抄本，由法国石泰安氏(R. A. Stein)于1961年编纂出版。本文采用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译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56页。

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①、《大臣遗教》(Blon po bkav thang)^②、《西藏王统记》(rGyal rabs sal bavi me long)^③等,剔除鬼神灵异的部份,互补各书所阙漏,综合整理出彼等所呈现当时吐蕃佛本斗争的情形与恩兰达札路恭的形象:

父王墀德祖赞六十三岁时,因在羊卓巴园赛马时坠马而死。是时,王子随即执政,是为墀松德赞,尚未成年,虽喜佛法,但以玛祥仲巴杰(Ma zhang khron pa skyes)、达札路恭(stag ra klu gong)等权臣威势极大,莫能敌也。舅臣玛祥仲巴杰(Zhang blon Ma zhang khrom pa skyes)说道:“王之寿短,乃系推行佛法之故,实在不吉祥。佛法说来世可以转生,乃是骗人的谎言。为消除此时之灾,应当奉行本波教。谁若再推行佛法,定将其孤身流放边地。从今以后,除本波教外,一律不准信奉其他宗教。小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是汉地的佛像,要送回汉地去。”并制订了禁行佛教的“小法(Khriṃ bu chung)”。大臣恩兰达札路恭(Ngan lam rta ra klu gong)则引进甚为纯净的本教,自己研读五部本教金蓝经,并向其他人传播本教。同时吐蕃寺院遭到拆毁,逻些大昭寺被改为屠宰场,杀了牲畜,剥下鲜血淋漓的皮子搭在佛像上,内脏等挂在佛像手上。信奉佛法的大臣芒氏(Mang为朗氏Lang之笔误)和末氏(vBal)二人等被治罪杀害。从此,吐蕃被驱入黑暗的深渊。在这段时期,吐蕃在“小法”的统治下,遭受很大灾难。王子长大成年,看到了父祖留下的文书,与部分大臣言道:“从文书中看,我的父祖辈认为佛法是好的。”于是下令由汉人梅果(rGya me mgo)、天竺阿年达(rGya gar ava nanda)及精通汉语者翻译从汉地带来的佛经。此三人在海波山(Has po ri)的鸟穴内将佛典译成藏语。这时,大臣恩达刺路恭(blon po Ngam ta ra klu gong)及舅臣(Ma zhang)等来到跟前,说道:“你们三个勤奋人在那里做什么?舅臣的小法有载:人死如果做冥福,定予只身流放;不得奉行供养蛮貊(Lho bal)之神佛。这些你们没听到吗?凡所行之诸多事务,如与佛法言论相同者,无需禀告于王,即当埋于沙中,然后以小法惩处。这是否还要辩论?”于是,对于此事,整事大臣会议(bkav yo gal vchos pavi mdun sa)接到紧急信息,要求处置。王弘佛之意志遭挫,暂掩信佛旗鼓,但为弘佛大业,不愿屈服,遂与拥佛大臣老桂氏(vGos rgan)设计翦除玛祥仲巴杰。先买通宫廷占卜师,声称为了王之御体及国政,需两位职权最高的重臣,在王预修的墓地内住三年,以增长王寿并兴旺国政。此神谕一出,老桂氏放话说在王身边者以我最大,自愿被埋,如此激起玛祥比试之心,玛祥中计,竟与老桂氏同埋于墓中,老桂氏用计逃出墓

①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part IV. New Delhi. 1962. 《贤者喜宴》为巴窝祖拉陈瓦于1565年所著。该书堪称为教法史料中最富参考价值的一部文献,最常为学者所引用。

② 十四世纪问世的《大臣遗教》为《五部遗教》(bKav thang sde lnga)中之一部。《五部遗教》为伏藏师额煎林巴(O rgyan gling pa)所发掘问世,其内包括有《神鬼遗教》《大王遗教》《后妃遗教》《译师遗教》《大臣遗教》等五部,属西藏文献类别中之埋藏本古籍(gTer ma, gTer kha),系由伏藏师受到神谕或梦啓,于秘密处发掘而出。故此类文献大略均属伪书。

③ bSod nams rgyal mtshan, *rGyal rabs gsal bavi me long* (《西藏王统纪》,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西藏王统纪》为索南坚赞于1368年,于墀松德赞时期之政教中心桑耶寺所著者。

穴，玛祥则永远被困于墓中，惨遭活埋，与世隔绝。王用计去除反佛大患后，为彻底击溃本教，命佛本辩论，本教方面的辩论首席代表就是昂姆大刺路恭（Ngam ta ra klu gong）。结果佛教大胜。接着，为弘佛需要正式的大型佛教道场，于是决定建筑桑耶寺。大刺路恭厌恶佛法，气愤地说：“建造神殿是佛教的事，我不好此事，我乃崇信本教。”王因此而惩治其罪，派人捆以草绳，以带刺的鞭子抽打，放逐北方，以儆效尤，此举使所有臣民畏惧，不敢再行反对。后来大刺路恭被赦回蕃廷，参与了桑耶寺的修建，建造了主寺旁边的黑塔，塔上方饰以保护之守卫神铁嘴夜叉，以供奉佛教。^①

上述后代藏文史籍所载的内容，有数处值得注意，其一：所载拥佛与反佛之间的斗争过程，宛若章回小说般高潮迭起，具高度的叙事性质。其二：不容否认，彼等执笔者确实阅及唐代吐蕃的材料，有部分的叙述与吐蕃传世史料所载相符，例如制订禁佛法律、二位大臣朗氏末氏遭到治罪遇害、整事大臣会议处理违反法律之人与事等，证明其著史叙事并非全然空穴来风。其三：其所记载疏略有俗世之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等层面，完全专注于宗教。其四：其所记载许多情节，均为吐蕃传世史料所阙载者，其真伪有待验证，例如赞普与大臣老桂氏之计赚反佛首脑玛祥仲巴杰，将之活埋，一举扫除了弘扬佛法最大的阻碍，此有类乡野传奇或趣谈的笔法，难以置信。

其五：彼等所载的玛祥仲巴杰（Ma zhang khrom [khron、grom] pa skyes [sky-abs]），据《大臣遗教》记载那囊氏族（sNa nam）有4位成员出任贡论（Gung blon 即大论），第一位为尚结赞（rGya tsha lha snang），第二位为芒聂色赞（Mang snya bse btsan），第三位即为玛祥仲巴杰（Ma zhang khrom pa skyabs），第四位为赞巴布仁（bTsan pa bu ring）等^②，意指玛祥仲巴杰出自墀松德赞母舅氏族那囊氏，且曾出任大论。然而，以此载记较之于敦煌古藏文卷子 P. T. 1287《吐蕃赞普传记第二》（即吐蕃历任大论世系表）所载，除却尚结赞（rGya tsha lha snang）外，其余三者之名均不见于属吐蕃传世史料《吐蕃赞普传记第二》之中，更何况尚结赞之名于《吐蕃赞普传记第二》载为 rGyal tshan lha snang，二者有所出入，此代表《大臣遗教》此处的载记并不可靠，大有疑义，不能采信。纵使采信其出自外戚氏族那囊氏，但在其未出任首席宰相或群相，乃至于其他官职的情况下，何来权力处理或干预朝中事务？更何况其名并未出

① 以上有关后代藏文史籍，所载之墀松德赞早期吐蕃佛本斗争的情形，与恩兰达札路恭的形象，主要参考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译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56页。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Op. cit. 叶78下、叶89下-90上、叶91上、叶96下。Blon po bkavi thang yig（《大臣遗教》），叶65下-66上，gTer ston O rgyan gling pa，bKav thang sde lnga. Part five, Blon po bkav thang yig. paro. 1976. 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0-127页。上述各处之玛祥仲巴杰之藏文名字，各书所载不尽相同，但所指均为同一人；另大刺路恭或达札路恭之藏文名字，亦同于玛祥仲巴杰藏文名字情形相同。

② Blon po bkavi thang yig（《大臣遗教》），叶12上，第4-5行。

现于吐蕃传世史料及汉史料之中，因此，其人其事很可能如同“双母夺子”“宴前认舅”^①以及“朗达玛毁佛”^②般，乃后代藏史撰著者所创造出来虚构的人物与故事，^③用以象征佛本斗争过程中，拥本大臣之顽劣愚昧与残暴，拥佛人士之智慧无双，历经千辛万苦，终克服横逆，促使佛教得以弘扬于吐蕃。

其六：比较吐蕃传世史料、汉史料所载之恩兰达札路恭事迹，与后代藏文史籍之载记，吾人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既有南辕北辙之处，亦存有极为雷同之处。前者所载，恩兰达札路恭原非佛教徒，于墀德祖赞遇弑之时，附合辟佛势力，但于墀松德赞继立后，即戮力效忠于赞普，为吐蕃作出许多贡献，甚至改变自身的信仰，参与779年由赞普亲自主持的桑耶寺拥佛盟誓，终至位极人臣。而后者所载，恩兰本身为彻头彻尾、死忠的本教徒，不但执着于自身的信仰，而且始终与拥佛阵营对抗，直至辟佛首脑玛祥遭铲除以后，自身亦因反对建筑桑耶寺而遭放逐，最后屈服于蕃廷的意志被赦回，参与了桑耶寺的建筑。二者所载之人与事，在叙述情节发展的主架构，基本是吻合的，开始时二者均载恩兰为辟佛者，最后恩兰改宗为佛教徒，佛教得到最后的胜利。换言之，后世之撰史者于撰述恩兰达札路恭之事迹时，事实上是掌握了某些古老的材料，但却漏失更多、更宝贵的史料，诸如敦煌文献、碑铭以及汉史料等等，而且又受到唯宗教史观的指导，以致在编纂书写时，创造了辟佛的首脑人物，却将事实上存在的人物如恩兰达札路恭，拟成配角，再设计出许多虚拟的情节，而制造出一出佛教突破困境，最终战胜邪魔外道，激励人心，坚定佛教信仰决心的历史传承，试图影响世人并永垂后世。此与彼等所制造之朗达玛毁佛事迹般，如出一辙。

① 例如《西藏王统纪》《西藏王臣记》等教法史料，均有如下记载：墀德祖赞原配姜摩尺尊（vjang mo khri btsan）生姜陀拉温（vjang tsha lha dbon），由于俊美无双，遣使赴唐求婚，唐室许以金城公主，姜陀拉温于迎娶途中突遭变故横死，金城公主无奈改嫁满脸胡须的家翁墀德祖赞，于阳铁马年生墀松德赞。墀德祖赞另妃那囊氏，心生嫉妒，声言我亦有孕，趁墀德祖赞出外巡查，将墀松德赞据为己出，金城公主投诉无用，整日以泪洗面。墀德祖赞返回获知原委，声明待墀松德赞满周岁，为设站立喜宴，届时那囊氏及汉人舅氏前来聚会，再行辨明。当日那囊舅氏及汉人舅氏分立两侧，赞普将盛满酒液之金杯，交与墀松德赞，吩咐自行分辨谁是舅氏，将金杯献与舅氏，墀松德赞举杯开步，迳赴汉人舅氏跟前唱云：“墀松德赞乃汉家甥，何求那囊为舅氏”，将金杯献于汉人，金城公主破涕为笑……。上述即为“双母夺子”“宴前认舅”故事内容，详见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纪》，第117-119页；五世达赖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第34-35页。

② 详见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第339-358页。

③ 笔者于1989年曾撰写《玛祥仲巴杰与恩兰达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统建立前的政教纷争》一文，文中质疑“玛祥仲巴杰”并非人名，而是掌军权之母舅氏族集团的代称。任小波氏指称此主张属“臆测”。按“臆测”乃凭想象揣度、推测之意，于此，笔者有必要予以说明。由于“玛祥仲巴杰”此人并不存在于吐蕃史上，此名疑系后代藏族史家所制造，这是毫无疑问且可以确认者。因此笔者从文献上找出四个层面的理由，分别为1. 奇怪且不合理的名字；2. 于吐蕃传世史料上未见其名；3. 从未担任过任何官职包括大论、群相等；4. 不合情理且令人发噱之遭骗被活埋的情节等，而认为“玛祥仲巴杰”并非人名，而是后世藏族史家所制造的一个群体的代称。对于一个有疑问的名词，笔者在有理有据的情况下，尝试解析其内含的真正意义，识者对于如此解析是否妥当？是否合理？当然可以评论。但在未详予评析则下“臆测”一词，似乎有失公允。详见林冠群《玛祥仲巴杰与恩兰达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统建立前的政教纷争》，第316-349页。任小波《公元763年吐蕃陷长安之役——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第113页。

六、结论

恩兰达札路恭得以跃上历史舞台，除了揭发赞普遭弑及举发逆弑元凶外，主要仍因其提议兴师直取长安，并于长安主导建立傀儡唐廷一事，而受到蕃廷褒扬，为其竖立一座造型奇特的石碑，将其为吐蕃所建立的功劳，以及受到蕃廷褒奖的内容，一五一十地雕刻于该石碑之上，使得属于八世纪中叶时期的人物，至今因此碑铭的载记，而仍鲜活地呈现于今人的眼前。

恩兰达札路恭非吐蕃本土氏族，身份特殊，于竞争激烈的吐蕃官场上必须具备政治敏感度，藉以洞悉时势，方能力争上游。其于墀德祖赞遇弑前后，本教徒势力方殷，趋附于本教阵营，诬蔑2位信佛宰相为弑杀赞普元凶；待继位之赞普渐得势以后，更弦易张，效忠赞普，运用对李唐之熟稔，发挥所长，供赞普咨询，得以持续于蕃廷平步青云，甚至改变自身原有信仰，改宗佛教，以附和赞普的意志。由此可以了解其柔软的身段与灵活的政治手腕，充分显现出归化于吐蕃的外族，所具有的特征。特别是利用蕃唐之间强弱形势的逆转，唐代宗遣使面告李唐不再执行先皇的承诺，缴纳贡赋五万匹汉缯之时，其建议兴兵攻打李唐京师，以惩罚李唐之背盟，赞普采纳，恩兰达札路恭因而获任为攻打长安的四大将领之一，不但完成赞普所赋与的任务，且于13天占领期间，完成立帝、改元、大赦、署置百官等中原建立新朝廷的一系列必要措置，于此确证其为不折不扣深谙李唐之道的“李唐通”，汉史料载记其具汉式姓名“马重英”，其来有自。此代表其早与中原有密切往返，只是史乘失载。其所提议直取长安一事，乃在知悉李唐内部紊乱，可一举而成功的分析下，向赞普建议，这是唐弱蕃强的局势使然，在李唐悔约背盟的情况下，吐蕃执意兴师问罪，大军直入长安，乃是“必然”，并非“偶然”。恩兰达札路恭得以叱咤吐蕃政坛，并于781-782年间荣登吐蕃首席宰相宝座，泰半是因处理对唐事务。然而“成也李唐，败也李唐”，其于779年曾兵败于川边，颜面大失，致更加仇恨李唐。唐德宗于即位后改变对蕃政策，致力于与吐蕃和谈，双方于780年议和，决定画界盟誓，而恩兰达札路恭反对，于782年遭到去职处分，从此消失于吐蕃历史的载记之中。恩兰达札路恭因其特殊的姓氏，恩兰 Ngan lam 字义为恶趣、恶道，相对于佛教 Dam pavi chos（正法）是为“外道”异教之义，致为后世藏史撰述者，将之形塑为反佛阵营的大将，并杜撰出佛本斗争的情节，将恩兰达札路恭描述为反佛的狠角色，致使吐蕃时期的恩兰达札路恭与后代所撰述的恩兰达札路恭，有着南辕北辙的形象。其忠心于赞普，为吐蕃立下彪炳功勋的真实面目，于后世竟遭扭曲为反朝廷、反佛的巨奸大恶。如此际遇，让吾人对治史如部分后世藏文史籍者，如此厚诬古人，不禁兴起慨叹矣！